

大学素质教育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Suzhi Education

学刊

Journal

主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

2020年1月20日第一期 总第27期

目 录

素质教育与文化自信 | 专栏文章

【引领视角 妙言要道】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 张岂之：论文化自信与素质教育

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胡显章：提高哲学自觉自信 深化文化素质教育

东南大学原高教所所长 陈 怡：“真善美”刍议

【推动视角 融会贯通】

广东工业大学 汤耀平：发展素质教育既要“架天线”又要“接地气”

——以广东工业大学的实践为例

北京理工大学 王晶晶等：高校辅导员应对方式与自我判断、社会支持的调查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肖 雄：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引领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北京理工大学主题教育活动的分析思考

【实践视角 独具匠心】

上海交通大学 丁晓萍：中国优秀文化的“浸润式”培养模式

武汉大学 冯惠敏等：打造两大“导引”课程 助推通识教育改革

——以武汉大学新一轮通识教育改革的新看点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陈正江：素质教育课程与课程素质教育结合有效载体研究

——基于“课程社团化”的探索与实践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无一例外受到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总书记关于素质教育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为我们深化教育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在关注素质教育、建立文化自信的新时代教育精神引领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召开了 2019 年年会暨第八届大学素质教育高层论坛，通过书记校长论坛、专家学者对话、专题论坛、工作坊、圆桌会议、论文交流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了“素质教育与文化自信”主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分享。

在本次会议中，我们收到了来自 58 所高校的 160 余篇高水平的文章投稿，从多个维度上对“素质教育与文化自信”进行了阐释，为素质教育理论提供了新思想、新视角，为素质教育实践提供了新道路、新经验。本期学刊从中摘选部分优秀文章，以“引领视角”“推动视角”和“实践视角”进行汇编，分享来自当前高等院校推动素质教育的实践经验，以及发挥先进文化对师生、对学校、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对于树立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要实现伟大梦想，离不开优秀文化所激发的精神力量。想要继承好、发展好自身文化，首先就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这就是“文化自信”这一时代课题的深意所在，也是素质教育的使命所系。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将一如既往，政治上坚持高站位；思路上坚持大格局；事业上坚持谋长远；工作上坚持善作为。加强素质教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增强理论创新能力；深化重大政策研究，增强咨政服务能力；聚焦素质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研究，增强引领改革发展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增强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努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教育学术社团！

论文化自信与素质教育

张岂之

(西北大学, 西安 710069)

摘要:近三十年来谈论中国教育离不开“素质教育”,但教育界对其理解还不很一致。本文从中国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出发,介绍了不同领域对“素质”概念理解之分歧,指出了教育界比较公认的“素质”界定。文章细致系统地梳理了“素质”引入教育和提出“素质教育”的社会历史背景;指出将人看成“人力资源”用以发展经济,以及在基础教育中针对“应试教育”的教育扭曲现象和在高等教育中应对“狭窄的专业教育”弊端是提出“素质教育”的主要缘由。由于人所从事的领域、职业与角色不同,对其要求的素质结构与内涵都有所差异,因而造成繁杂而有差异的“素质结构”,从而出现了综合素质和核心素质(素养)概念。文章列举了一些各有特点的综合素质和核心素质的结构,它们各有短长。作者认为,素质中最为核心的应是信仰,它包含由其产生的道德和态度,并提出了进行这种教育的某些建议。文章对“发展素质教育”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素质教育能否“科学化”,如何将“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或模式,以及素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三个问题,并分别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素质;素质教育;素养;综合素质;核心素养;发展素质教育;知识;能力;信仰

2019年3月,我收到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2019年年会暨第八届素质教育高层论坛邀请函,心情很激动。这表明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学术理论研究一直没有中断,我国教育实践的深化也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一、习近平同志论述我国教育的两大任务

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教育强国,全面深化素质教育,明确认识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立德树人。立德树人,也就是总书记说的“培根铸魂”。

2018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阐述了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他说：“要把立德树人、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个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习近平同志以上的论述，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努力加以贯彻落实。为此就必须树立文化自信。

二、文化自信是全面落实我国教育文化伟大目标的基石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6 年 11 月 30 日，他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再次论述了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

关于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可归纳为：

第一，文化自信应认同：中华文明从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开始，5000 多年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上是仅有的。

第二，文化自信应认同：文化自信反映了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其他不说，只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第三，文化自信应认同：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都对人类做出了贡献；我们必须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第四，文化自信应认同：在中国，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给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这一点我想做些说明。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回顾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没有中断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文明中包含着独特的科学精神。2015 年 12 月 7 日下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和她的团队经过长时间的科学实践，发明了从植物中提取青蒿素，并制成药品用于治疗疟疾，在非洲使用，取得重大疗效。

2015年1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三、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陵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精神标识

黄帝陵位于今陕西省黄陵县，历代都到这里祭祀人文初祖黄帝，黄帝、黄帝陵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在氏族部落的繁衍过程中，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当时，国家雏形确立、文字初创，制作车、船，学会打井、养蚕和缫丝。推进原始农业，制作冠冕衣裳，又设官治民，奠定了物质和教化的基础。后代子孙推崇黄帝、祭祀黄帝，认定黄帝是中华的人文初祖。

从黄帝开始，中华有五千多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史。通过《史记》等史书记载，中华民族的子孙们了解到民族曾经走过的漫长文明建设之路。《史记》一书的作者，是西汉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前145—约前87年），今陕西韩城人。他撰写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介绍了他父亲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六家”即六个思想文化学派：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在《史记》中还写了《孔子世家》，并为孔子的弟子们立传，称孔子为“至圣”。这些对中华民族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还要提到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32—92年），今陕西咸阳人，他继承父业，用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汉书》（关于两汉时期历史的大部分）。《汉书》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

四、《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文共四大部分，论述了2017—2025年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义、总体要求、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其中的“主要内容”共有三项：（1）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2）宣传中华传统美德；（3）发掘中华人文精神。

《意见》还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

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还应“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五、发扬“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精神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西汉时李广将军在傍晚时打猎，看见一只老虎，他拉弓射箭，以为老虎已被射杀。第二天去看，并非老虎，箭已射进大石之中。李广再射一次，徒劳无功。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人立志做大事，矢志不渝，付出艰苦劳动，是可以成功的。联系到今天，可以这样说：同学们学习新科技，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要努力，就会学好。

还有一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李芬芳，它们虽然不能说话，但吸引了许多人到树下赏花尝果，以至于走出一条小路。这说明：人有优良品质，有美好理想，再伴之以扎扎实实的工作，就可以成功，而且会有很好的感召力。

六、结束语

2018 年 3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我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的迸发出来，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我相信，只要 13 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总之，文化自信是国家兴衰的命脉，是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基石。文化自信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息息相关，是我们从事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和保障。

提高哲学自觉自信 深化文化素质教育

胡显章

(清华大学, 北京 100084)

摘要:文化自觉自信是深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与内涵, 哲学自觉自信是文化自觉自信的灵魂与最高境界。引导广大师生砥砺哲学性格, 是深入文化素质教育, 推进以文化人、文化育人的重要课题, 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关键词:素质教育; 文化自觉自信; 哲学自觉自信; 批判性思维

文化自觉自信是深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与内涵, 而哲学自觉自信是文化自觉自信的灵魂与最高境界。现就提高哲学自觉自信, 深化文化素质教育谈几点认识。

一、从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谈起

自新世纪始, 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已成为我国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命题。不可否认, 从批判性思维教育实践看, 在现代高等教育, 西方特别是美国是走在前面的。

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继承发展了爱利亚学派的论证方法, 提出了探索知识的问答法, 主张并践行通过思辨、讨论发现真理。这被视为批判性思维教学法的最初发端; 中世纪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和“近代科学始祖”的笛卡儿为促使人成为自然界和自身的主人, 提出“系统怀疑方法”, 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 对欧洲哲学、科学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 继而哲学家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系列论著中提出了系统的批判哲学观, 他强调“教育之目的就在于使人成为人”, 突出人的主体性和人本主义精神, 倡扬理性的自我批判, 推进逻辑理性与思辨理性的结合, 将仰望星空追求真理和心中的道德自律统一起来, 他的哲学观、教育观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初叶在工业革命持续推动之下, 人类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促进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民主主义教育家杜威为适应美国社会的历史转型, 提出教育的价值在于通过人的生长来促进社会的进步, 他批判了传统的教育思想使受教育者以“知识旁观者”实现认知过程的理论,

提出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确定假设和验证假设”五步思维法。确立问题意识、运用反思性思维、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中心地位,是这种教学模式的主要特点,他的教育思想奠定了美国现代教育的重要基础,杜威被称为近代倡导“批判性思维”的鼻祖。1919 年,蔡元培、胡适、陶行知等邀请杜威来华讲学两年两个月,为推行杜威的哲学与教育思想提供了讲台,特别是促成杜威的五步思维模式引入中国学校,这可以说是西方批判性思维教育对我国的最初而且比较广泛的影响。在 20 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下,杜威的教育思想未能在我国得以持续推行,一度还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批判性思维并未成为中国教育明确追求的目标。20 世纪 40 年代,在美国批判性思维成为教育改革的主题;自 20 世纪 70 年代始,批判性思维教育得以进一步发展。1991 年,美国《国家教育目标报告》明确“应培养大量具有较高批判性思维能力、能有效交流、会解决问题的学生”。将批判性思维能力当作重要的教育目标。美国加州大学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批评中心保尔教授断言:“批判性思维应当成为构成 21 世纪教育的本质性基础。”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面向 21 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第一条明确指出:“教育与培训的使命是培养学生批判性和独立的态度。”北美高校普遍设置了批判性思维课程,并努力将批判性思维体现在教育过程。相比之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高校缺乏必要的自觉和实践,批判性思维教育没有列入教育研究与教学实践的整体规划与目标之中。

21 世纪之初,在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背景下,批判性思维教育开始在中国兴起,成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和深化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切入点。这一过程常看成是对美国教育思想乃至哲学理念的借鉴和对中国教育思想乃至哲学理念的批判。从教育实践看,美国批判性思维教育的确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但是,对自身全盘否定,对他人完全照搬,并不是符合建设性批判思维原则,也是缺乏文化自觉自信的体现。

深究中国历史文化,可以探寻到批判性思维的根源和表现形式。在白鹿洞书院,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大儒朱熹为书院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即《白鹿洞书院学规》所阐扬的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源于古代经典《礼记·中庸》)。这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士人追求批判性思维的最初记录;我们还可以发现《论语》提出的:“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概括了人言行举止包括求学问道的各个方面,既体现批判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又为建设性的批判

规定了有效途径。归纳起来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看得明白，听得清楚，能判断是非，辨明真伪，同时要抱恭敬谦和、诚信忠厚的态度待人处世，要保有敬业精神，要有问题意识，严谨审慎，还要善于防止自己的情绪影响对事物的判断，要防止见利忘义。《墨经》（又称《墨辩》），同样具有丰富的论辩内涵。如《小取》开篇语：“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强调了论辩察疑明理的重要性，同时，要求“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表示对论辩者的尊重。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许多倡导批判与论辩的事例，如先秦的稷下学宫，“朝廷搭台，学者唱戏”“不治而议论”，孟子、荀子等百家争鸣，十分活跃，期间形成《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就是批判包括孟子的12位学者的思想。学者士人们继承了老子、孔子、法家商鞅等人的思想，在辩论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南宋时期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大儒朱熹与书院山长张栻论辩《中庸》“三日夜而不能合”，“鹅湖之会”则是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论争，都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事实表明，中国古代就有宝贵的对批判性思维的追求，而且，比起当代某些对批判性思维偏颇的理解，如将批判性思维与“否定”画等号；或批判矛头所指只有他人，而不反思自身；将批判性思维局限于方法和技巧，忽视精神和态度等等，古代士人在“九思”中体现的批判性思维有许多值得弘扬之处。我们过去对于传统文化中批判性思维的认知是不够的，这需要文化自觉和自信。我们应该自觉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朴素进步历史观等，是发展当代建设性、批判性思维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的沃土。

二、文化自觉自信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与内涵

多年来，我们对提高文化素质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如开设文化素质或通识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活动、加强网络文化建设、进行文化社会考察等，这些努力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对于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强化相关的自我教育来说，提高文化自觉自信是带有普遍而根本意义的。

顾名思义，文化素质教育离不开文化氛围的营建和文化的给养。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中提高文化品质，这离不开文化自觉与自信。云杉在《红旗文稿》中指出：做好文化自信，“需要我们以理性、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化的反

思、比较、展望，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进一步坚定我们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做到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指出：“不忘本来”就是勿忘“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吸收外来”是指“越是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越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着眼将来”是指“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历史的辉煌，更来自当今中国的蓬勃生机，来自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做好上述文化自信的前提是需要文化自觉，就是对生活在其中的文化的由来、特色包括优长与不足以及走向有清楚的认识，并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述，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继而对其价值与生命力充满信心，自觉植根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优秀外来文化，弘扬适应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的先进文化。只有这样，文化素质教育才能收到充分的实效。

就以培育批判性思维来说，以往常常认为中国人缺乏批判性思维，或者如几位美国哲学教授所指的，“中国的思想家看重做事的正确方式（道），而西方的哲学家更注重事物之真”，中国人“被告知要尊重长者，在等级规定范围内行动，那么挑战假设和质疑指定的观点也许对中国人来说就成问题了”；也是这几位哲学教授指出：经过反思，发现以上现象具有普遍性，并非中国所独有。而且“中国式思维和西方思维之间在技能的和心智习性上的任何差异，都并不必然是敌对的观点”。“这些差异反而可以成为两种思维系统综合发展的出发点。”比如，在孔子倡导的“九思”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士人在强调质疑的同时，还规定了系列人文要求，以今天的术语讲，体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综合追求，体现了为学与为人的统一，而这正是建设性的批判思维所要求的特征，也正是多年来文化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理念。中国式的思维方式长于综合和注重内在的修为，而西方的思维长于分析和求真，我们应该在理性会通中西思维特征中做好文化自觉自信自省，不断实现持续的自我超越，不断攀升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三、哲学自觉自信是文化自觉自信的灵魂与最高境界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1997年于北京大学提出的，他还谈到，文化自觉是一个反思的过程。他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自己不断进行学术反思，思想的再思考，这可以说是个人的“文化自觉”，实际上就是批判性思维活动。他一再呼吁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这种通过反

思来提高对主体思想的主动认识就是一种哲学自觉。因为“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活动，或者说，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方式”。“人类思想的反思维度，在人类的理论思维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了反思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哲学的思维方式”。目前，中华民族正在加速实现伟大复兴，文化的反思和振兴是其重要的前提和内涵。中国的大学在本质上是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对于民族伟大复兴肩负重大的责任。为此，大学人首先应该通过整体性的反思，认识在人类文明进程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中，中国文化包括大学文化的由来、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有益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向，以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发挥好先进文化对自身、对社会的引领作用。

“按照哲学家黑格尔的观点，一个民族的主体意识自觉是一个民族现代复兴的基本标志，因此，这种社会自觉或文化自觉的呼唤，是奠基于哲学思维自觉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哲学对人的行为具有价值规范、思维导向和理论升华的功能，欲使文化行为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并沿着理性方向前进，就应该使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正如马克思 1842 年在《科隆日报》社论中所指，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大学人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自觉自信，特别是哲学自觉自信，哲学自觉自信是文化自觉自信的灵魂和最高境界，提高哲学自觉自信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

四、自觉砥砺哲学性格，深化文化素质教育

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哲学应该成为大学存在与运行的基础，哲学生活理应成为大学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正如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所说，“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在中国，哲学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关切的领域。”没有哲学的导引，大学就会像一个没有“神灵”的庙堂。在 1999 年中国科协首届年会上科协主席周光召指出：为什么 20 世纪初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因为德国“发挥哲学的突破和指导作用”，“德国在哲学上率先脱离机械论和绝对论的束缚，发展了辩证法和唯物论。德国的科学家都有很高的哲学素养”。实际上，德国一度成为世界教育和科学中心，正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高校所实施的哲学

与教育的融合，或者说正是康德、费希特、洪堡等哲学家兼教育家所奠定的哲学文化基础，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影响。

从中国看，在有了现代大学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梅贻琦时期的清华以及以其为背景的西南联大都是哲学家荟萃的，学校领导自身既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熏陶，同时，又吸纳了德国、美国的哲学思想与教育理念，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高峰期。其间，梅贻琦的教育论文《大学一解》就是基于中国古代经典《大学》核心内涵的“大学之道”，吸纳了美国通识教育理念的教育哲学成果。梅贻琦提出了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即在于《大学》之开篇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指出当今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明明德”与“新民”之二义。并强调“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故大学教育应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从中可以看出，正是中国哲学理念形成了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与基础。

在新中国，以蒋南翔为代表的教育家，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蒋南翔校长亲自任哲学教研室主任，领导开设哲学课，并且自身是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问及清华五六十年代的老校友：什么是学校给以的最重要的教育？许多校友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比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干、注意抓主要矛盾、防止片面性、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要有大局观念、整体意识、群众观点，等等，就是哲学思维的历练。

以上事实，对当今的师生砥砺自身的哲学性格应该具有启迪意义。

实践表明，努力砥砺自身的哲学性格，是当今大学人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也是以文化人、文化育人的重要课题，应当予以充分重视。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站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中国实现向创新型国家转型，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特别要强化理论思维，特别是哲学思维。习近平同志在 2019 年第 1 期《求是》杂志发表《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文，指出“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哲学基础，是我

们认识世界、追求真理、改造世界、完善自我的思想武器,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基本途径,应该成为深化文化素质教育,砥砺师生哲学性格的重要任务。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文化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环境,文化哲学也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文化哲学是对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的理性思考,是对文化现象的哲学理解和历史阐释。当代文化哲学自身将人对真善美的综合追求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它对高校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文化哲学作为人类追求文化整体性时代的哲学表现形式,对于科学与人文、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割裂等文化整体性消解现象具有抵制和导引作用;当代文化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并从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高度界定文化,把握文化的意义与价值,这对于开展研究型教育,调动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的主动性、积极性,具有导引作用,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

最后,我们再回到批判性思维这个命题上。如上所述,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活动。“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它启迪、激发和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永远敞开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空间,促进社会的观念更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艺改进和艺术创新,从而实现人类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提高哲学自觉,砥砺哲学性格,不仅与批判性思维教育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必定有利于批判性思维沿着建设性的方向前行,并在更加广泛的维度上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理性的精神文化保障。

引导哲学自觉自信,砥砺哲学性格,应该成为深化文化素质教育永恒的命题。

致谢: 本文在前文基础上补充完成,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晓宇、闫凤桥、刘云杉教授,以及北京理工大学庞海芴教授的宝贵指点,特别是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院余东升教授的深入讨论,特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 [1] 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载[J]《红旗文稿》2010年第15期.
- [2] 袁贵仁.人的素质论[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17-18.
- [3] 彼得·费希万,等.作为普遍人类现象的批判性思维——中国和美国的视角[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 [4] 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46,150.

[5] 邹广文. 什么是文化哲学[N]. 光明日报, 2017-06-19 (第 15 版)

[6] 黑格尔. 逻辑学上卷[M]. 杨一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7]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新世界出版社, 2004: 3, 5.

“真善美”刍议

陈 怡

(东南大学 南京 211189)

摘 要: “真善美”是人类永远追求的目标, 常被人们在种种场合提及。但其真正的内涵却不为人们注意。如果认真思考一下: 人类为什么要永远追求“真善美”? “真善美”的本质是什么? “真善美”三者之间应是怎样的关系? 是并列的还是层次之分的? 其先后顺序应如何? 习惯上所讲的“真善美”有没有问题? 能不能讲成“真美善”或“美真善”? 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 以期引起大家的探讨。

关键词: 真善美; 知情意; 和合文化

一、“真善美”提法的由来

关于“真善美”提法的真正起源, 恐怕很难说清, 但从康德的“三大批判”中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启示?

众所周知, 康德是一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 是 18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俗称“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批判哲学”的大厦。按照通常的理解: 《纯粹理性批判》是探讨“理论理性”(即独立于经验的理性)在认知领域如何发挥作用认识经验世界, 得出的结论是: 人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感觉和知性二者的相互配合, 知性用实体和属性、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等十二个先天范畴对时间和空间中的感性材料进行综合, 确立了知识对象的客观统一性, 从而回答了“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总结出“人为自然界立法”的观点, 并且提出要“限制知识, 给信仰留下地盘”, 其出发点是探讨“真”; 《实践理性批判》是探讨“实践理性”(即意志)在超验世界中如何发挥作用, 得出的结论是: 发挥“自由意志”的作用, 按照“道德律令”(即“自律”)决定自己的行为, 总结出“人为自己立法”的

观点,并提出“人是目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人当作工具”,其出发点是探讨“善”;而《判断力批判》是探讨判断力在情感领域如何发挥作用,就是通过反思的判断力,包括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进行审美判断,总结出“判断力为自身立法”的观点,并给出了“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著名定义,其出发点是探讨“美”,而且旨在用情感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连接起来,最终形成他的整个由知、情、意的先天原则构成的先验人类学体系。康德的“三大批判”分别发表于1781年、1788年和1790年,而且按照顺序分别探讨真、善和美,所以,人们就习惯于用“真善美”这样的方式表述三者之间的顺序,并将其作为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了。

二、“真善美”提法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虽然“真善美”的提法和康德“三大批判”的论述主题及出版顺序一致,似乎顺理成章,而且已被大家广为接受,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了。但是,这种提法却带来一个问题:似乎“美”成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所以,有不少人都在论述这个命题,特别是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而且还搬出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世界的”作为他们的“尚方宝剑”。但笔者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善”可以产生“美”,人因为善良而美丽,但“美”无法一定带来“善”。所以,“善”高于“美”。康德也有一个著名的命题:“美是道德的象征。”由此也可看出:“善”是高于“美”的。为了论述这一命题,我们还可以问一问:如果一个人只追求自己的“美”,能处理好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吗?如果人类只追求自己的“美”,能处理好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吗?从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何从谈起?所以,如果强调“美”的重要,可以这样表述:那些体现了“善”的“美”,才是具有真正价值的“美”。这正是中国文化中所推崇的“尽善尽美”,而“尽善尽美”的表述恰恰强调了“善”高于“美”。同理,只有那些体现了“善”的“真”,才是具有真正价值的“真”。再者,“真善美”的表述方式也是和康德构建他的哲学体系的初衷不一致的。在康德心目中,“人是理性的动物”无疑是一个自明的基本事实。最广义的“理性”在康德看来,是人类的三大心灵能力:认识能力、感觉快乐和不快乐的能力及欲望能力,简称为“知、情、意”的“三大能力”。而这“三大能力”所追求的目标分别是“真”“美”和“善”,即“真美善”,显然和习惯上所说的“真善美”不一致。因此,如果接受“知情意”的表述顺序,就不应接受“真善美”的表述

顺序；如果接受“真善美”的表述顺序，就不应接受“知情意”的表述顺序。二者必居其一。那么，该接受哪一种表述呢？当然应该尊重康德本人的观点。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目的论判断力的方法论》中明确指出：作为目的论系统的自然的终极目的在人身上的体现有两个层次：一是人的幸福；二是人的文化。而幸福是不确定的、时常变化的、人人不同的，而且因为人总是不会满足的，因而对幸福的追求会使人陷入机械性，沦为手段，只能是有条件的目的，而真正的终极目的只有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只在于追求“真善美”的文化。（注：笔者认为：幸福不一定体现“真善美”，而“真善美”却一定体现为幸福，所以，“真善美”高于幸福，只有体现了“真善美”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如果没有人，整个大自然的目的、机巧都将成为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荒野；但人之成为自然的终极目的，不是由于他的理性认识能力，也不是由于他的情感能力和对幸福的追求，而是由于他的欲望能力；而且也不是由于低级欲望能力（感性冲动），而是由于高级欲望能力即他的自由意志^[1]。由此可见，康德非常明确地认为：人类应将“善”作为最高追求。所以，按照康德的观点，表述三者顺序的方式不是“真善美”，而应该是“真美善”。由此，笔者进一步认为，三者的关系应是：“真”为基础，“美”为形式，“善”为目的。

分析到此，关于“真善美”的话题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依据逻辑分析的彻底性，还应该讨论一个问题：“真”和“美”的顺序，是“真”在先，还是“美”在先？要回答这一问题，其难度要大于上面讨论的：是“美”高于“善”还是“善”高于“美”的问题。因为这和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关，似乎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意味。下面不妨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看一看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三、中国文化中的“真善美”关系

为说明中国文化中的“真善美”关系，首先需了解中国文化的性质。那么，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呢？笔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以“道”为灵魂、以“合”为途径、以“和”为目标的和谐文化。接下来，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性质，就必须了解“道”“合”和“和”的内涵。

“道”是什么？《说文解字》的解释是：“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即人行走，用以导之、以达目标的那个东西。从“形而下”理解，是道路；从“形而上”理解，就是方法、规则、规律等。《易传·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意思是：“阴”和“阳”的相互

作用和运动就是“道”，按照、遵循“道”做事就会得到“善”，成就“道”就成就了自己的本性。如果用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话语描述：“道”就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合目的”又好像“无目的”，“无目的”又好像“有目的”，正如《道德经》21章所描述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情实)；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体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统一，二者的统一就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此外，在中国文化中，“道”无处不在，万物莫不有“道”，而且，“道”既是“真”，又是“善”，还是“美”，更是“真善美”的统一。所以，“道”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没有了“道”，中国文化就失去了灵魂。

“合”的内涵是什么？在中国文化中，“合”的内涵非常丰富。首先可以想到的是中国人的行事原则：“合情、合理、合法”以及法治治理准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绳之以法。那么，“合情、合理、合法”的内涵是什么？笔者认为，按照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目的论判断力”分析方法，“合情”就是对“情”和“景”的合目的性，就是“美”。同理，“合理”就是“真”，而“合法”中的“法”有两个含义：“内在的法”是道德，“外在的法”是法律。二者导致的都是“善”。可见，在中国文化中，中国人信奉的行事准则就是追求“美真善”。著名学者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而“情本体”（其实称为“情本位”更合适）是乐感文化的核心。钱穆先生认为：“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论语要略》）。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一种“情理文化”。这些都说明：在中国文化中，“情”重于“理”。现代心理学也认为：“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汤一介先生进一步提出：“美”的最高境界是“情景合一”；“真”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善”的最高境界是“知行合一”。笔者认为，应将“真”的境界和“善”的境界互换，即“真”的最高境界是“知行合一”，“善”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这“三个合一”正是“合”的最高层次的含义。特别是其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被钱穆先生称为“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和”的内涵是什么？在中国文化中，“和”的内涵同样很丰富。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和而不同”，提倡多元的统一；二是“和谐”，如《道德经》42章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意思是：“道”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从浑然一体的状态化生出“阴”和“阳”，再进一步由“阴”和“阳”经由对立而成为“和谐”的第三种状态，由而就可化

生出万物。万物都是“阴”“阳”以及二者的“和谐”所呈现的状态。上述的三个“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和“天人合一”，正是“和谐”的最高境界。

与中国文化的“情本位”相对，西方文化可以称为“理本位”文化。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人就接受了“人是理性的动物”的信条。与中国文化的“乐感文化”性质相对，西方文化可以称为“罪感文化”。因为从基督教的教义中，人生下来就有罪，称为“原罪”，所以一生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去“赎罪”。于是“原罪”和“赎罪”成为西方人人生的主轴，故西方文化可称为“罪感文化”。那么，人们会问：这两种文化谁优谁劣？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各有优劣。如果按照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应以中国文化的“情知意”为较合乎“情理”，因为人在面对一个事物时，通常会首先去审视，得到一个快乐不快乐或美不美的感觉，其次再去研究，最后再做出选择。这个过程就是“情知意”依次起作用的过程，这就应该是“美真善”的顺序。这样的排序，似乎也是符合康德的观点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强调：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才真正深入到了“一切哲学”，包括前两大批判的背后，即人的具有普遍性的情感能力。因为，首先，情感能力的原则是一切理论哲学的“入门”；其次，审美判断力也是实践哲学的入门^[2]。因此，“情”应该排在第一位，即“情知意”，从而对应于“美真善”。何况，“善”又具有更高层次的“美”的性质，所以，人类的所有活动，从追求一般层次的“美”开始，经历“真”的补充，进而达到更高层次的“美”（可称为“大美”，如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正好符合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十分完整，十分完美。然后继续发展，不断上升。

当然，“知情意”的做法也不是完全不可行。所以，二者可以“各行其道”。按照中国“中庸”哲学的思想，应“执其两端用其中”，或者更准确地讲，应既包涵二者又超越二者。这就是取“意本位”的立场，其实质正是“善本位”。因为“意”既包涵“情”又包涵“知”，同时又超越“情”和“知”。正如“善”既包涵“真”又包涵“美”，同时又超越“真”和“善”，是“必然”和“自由”的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于是，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康德。但是，应该记住的是：要以“善”为最高境界，守住“善本位”，既可以按“真美善”，也可以按“美真善”的路径去努力，实现“殊途同归”。笔者认为，这样的思路，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因为它体现了“多元”的精神。

讨论了中国文化中“真善美”的关系后,笔者认为,还需要讨论“知情意”三者之间的关系。从上述的介绍中可知,康德的哲学体系,“知情意”是出发点,“真美善”是结果,是目的,但“知情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是平面的关系还是立体的关系?未见明确说明。从他强调“判断力批判”是“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过渡和桥梁看,似乎三者是一维的线性关系。但在中国文化中,“知情意”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二维的平面关系,即“意统知情”。为什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因为北宋学者张载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心统性情”,并解释说:“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元亨利贞说》)也就是说:“性”即“理”,而“理”是“知(智)”追求的目的,所以“心统性情”即“心统知情”;但是,“心”如何“统”“情感”和“理性”呢?靠“意志”。“心之所之”为“志”,“志”者,“意”也,二者通用。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所以可得出“意志统率理性和情感”,即“意统知情”的结论。既然是“统”,就意味着“意”既包涵“知”和“情”,又高于“知”和“情”,所以三者之间应是二维的平面关系。可以将其比作一个三角形,“意”处于顶端,“情”和“知”位于底部的两端。这是一种十分稳定的结构,三者的地位和作用十分清晰。人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情感”、“理性”和“意志”和谐的整体。由此,中国文化中“美真善”的关系也应为“善统美真”。如果要再进一步探讨“道”和“美真善”之间的关系,则可表述为:“道统美真善”,四者是一个三维的立体关系。如将其组成一个三角锥体,则“道”处于顶端,“美真善”在底部的三个角。笔者认为,这种“统”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是“中庸”思想的发展和升华。因为“中庸”容易导致一维的平面思维甚至机械的平均思维。“道”的思维就是“统”的思维,因为“道”的本质就是“有”和“无”的辩证统一,即“道统有无”。顺便提及,现在有测量理性思维水平的“智商”,也有表征情感能力的“情商”,笔者认为,还应有表征意志力的“意商”或“志商”。因为“志商”比“智商”和“情商”更重要。如苏东坡在《晁错论》中所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希望心理学家们能在这方面予以关注,相信将来一定会出现。

讨论完上述问题后,还有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需要讨论,这就是“‘真善美’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人类要永远追求‘真善美’?”笔者认为,“真善美”的本质就是“自由”。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在他的《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书开篇就强调:“人的本质就在于追求自由。”“人类的自由,就在于达到真、善、

美的统一。”这说明，人的真正本质就是追求以“真善美”的统一为目标的自由。同时也说明：“自由”和“真善美”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一方面，“自由”的内涵就是“真善美”；另一方面，“真善美”的本质就是“自由”。此外，冯契先生还给出了“真善美”的含义及其和“自由”的关系：“真”指符合人们利益、合乎人性发展的真理性认识，做到“真”，使科学理想实现，就获得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自由；一切使人快乐、给人幸福的对象都可称为“善”，道德意义上的“善”是指涉及人伦关系的好的行为，做到“善”，使道德理想实现，就获得了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自由；“美”是一种自由的快感，做到“美”，使审美理想实现，就获得了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自由。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康德的观点，只有在“实践理性”的领域，即道德领域，人才有自由，即“意志自由”，而在“纯粹理性”领域，即自然领域，只有必然。这种对“自由”的界定过于狭窄。后来，人们已接受斯宾诺莎“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的观点，所以，可以给出下述结论：“真”可以使人获得人与自然的自由；“善”可以使人获得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自由；“美”可以使人获得人与自我（身与心）的自由。如果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人类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样的目标，当然是一个需要永远追求的目标。真心希望，崇尚“真善美”、创造“真善美”能成为每个人的人生目标。由此，真正的教育就必须基于“知情意”并以“真善美”为目标。无怪乎梁启超先生在 1922 年就提出“知育、情育、意育”的教育方针，而不同意“智育、德育、体育”的表述^[3]。笔者同意这一观点。

最后，还有一个说法值得讨论：科学求真，道德（宗教）求善，艺术求美。笔者认为，人认识每一个事物，都有对真善美的追求，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真善美。也就是说：科学有科学的真善美，道德有道德的真善美，艺术有艺术的真善美。只不过每个学科中三者的分量有所不同，如：科学以求真为主，道德以求善为主，艺术以求美为主，但都还有其他两方面的内涵。科学、道德和艺术三者的“真善美”共同组成更高层次的“真善美”，是为庄子所说的“大美”。

经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尽管可能还会继续使用“真善美”这样的表述，但对其内涵一定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很多观点也更加有数于心。同时还让我们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努力了解自己的以“道”为灵魂、以“合”为途径、以“和”为目标的和谐文化，从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以上观点，仅供方家参考。

参考文献:

[1][2] 邓晓芒. 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06-111.

[3] 梁启超. 为学与做人[M].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6.

发展素质教育既要“架天线”又要“接地气” ——以广东工业大学的实践为例

汤耀平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大学素质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 它具有系统性、长期性、目标性及时代性四方面特征。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大学素质教育面临着不同往日的崭新形势, 它在远大的教育目标、艰巨的现实任务及迫切的时代需求中发展完善。对高校而言, 发展素质教育要把握两个维度: 一是大学素质教育要通过“架天线”直面国家时代前沿; 二是大学素质教育要通过“接地气”瞄准经济社会需求, 从而在顶天立地的时空格局中培育时代新人,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资源与智力支持。

关键词: 新时代; 大学素质教育; “架天线”; “接地气”

素质教育, 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 是当今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发展素质教育, 推进教育公平,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高校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新时代中国社会内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发展素质教育既要在“架天线”中面向国家时代前沿, 又要在“接地气”中瞄准经济社会需求。

一、大学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及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 素质教育是一条始终贯穿于我国教育改革实践的主线, 在高

等教育中引发了教育思想、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大学素质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

（一）大学素质教育的本质和特征

概括来讲，大学素质教育的本质在于以教育滋养心灵、涵育品行、开发潜能，包括大学生的品德素质、能力素质、身心素质、文体素质等。一般来说，大学素质教育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

1. 系统性。大学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环节彼此衔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整体。在素质教育开展过程中，各环节之间只有彼此协调、互促共进，才能有效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2. 长期性。大学生素质提升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素质一旦形成，在短期内不会轻易发生改变。大学素质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探索矛盾点与重难点，在改革中持续推进优化。

3. 目标性。目标性是指大学素质教育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指向性，是为完成特定的目标而服务的。大学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 时代性。不同的时代，大学素质教育的教育重心有所不同，其内涵外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在过去，大学素质教育更侧重于学生的文化素养培育；在当下，大学素质教育更侧重于学生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创新能力培育。

（二）新时代大学素质教育面临新形势

1. 目标更远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中，大学素质教育要在中华民族“强起来”的逻辑框架中，聚焦“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因此，大学素质教育的目标不是顺应时代潮流，而是在培育时代新人的实践中引领历史潮流。

2. 任务更艰巨。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七大发展战略，以及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每一项任务都与素质教育密切相关。如果没有素质教育的人才资源与智力支持，这些战略目标与强国建设将难以完成。

3. 需求更迫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这意味着大学素质教育的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只有发展大学素质教育,才能实现国民素质的全面提升,才能让更迫切、更强烈的“中国梦”成为现实,否则就是空想。

素质教育要与时俱进。发展素质教育,笔者认为需要把握好两个维度:一方面,大学素质教育要“架天线”,面向民族国家时代前沿,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素质教育要“接地气”,瞄准国家经济社会需求,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新时代大学素质教育要“架天线”,面向民族国家时代前沿

中华民族正在加速实现伟大复兴。大学素质教育在本质上是社会文化的再生生产过程。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大学素质教育肩负重大责任。因此,大学素质教育必须要“架天线”,面向民族国家时代前沿。这主要谈的是大学素质教育“怎么看”的问题。

(一)“架天线”须面向民族国家复兴大任

“架天线”要面向民族国家复兴大任,这主要谈的是为什么而架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古今中外,关于教育和办学,思想流派繁多,理论观点各异,但在教育必须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说具体了,就是培养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才培养策略,始终体现了对民族发展诉求的回应。从20世纪革命战争年代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青年”,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又红又专的“合格建设者”,再到改革开放初期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乃至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中,大学素质教育培育时代新人的目标要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具有奠基性意义的首要目标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性的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承前启后的重大步骤和决胜关键;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接续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中呈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各阶段之间相互联

系、相互衔接，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大学素质教育需要通过教育不断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更新旧知、发掘新知、探索未知，从而接续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架天线”须辩证看待世界文明成果

“架天线”要辩证看待世界文明成果，这主要谈的是以什么样的态度而架的问题。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性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世界各国成为联系日益紧密的共同体，我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新时代新要求。新时代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警惕西方国家的价值渗透；另一方要筛选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①警惕西方国家的价值渗透。在国际化视野下，欧美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软实力，对出口到我国的文化产品进行包装设计，利用话语权优势将文化价值观强势渗透给青年一代。大学生涉世不深，很容易受欧美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近期我国香港地区发生一系列动荡事件，一些暴力行为甚至冲击到香港法治的根基，在其中，挑事者大部分是香港“愤青”。香港面临的复杂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势力的干涉，把香港变成中美博弈的新焦点；另一个是近些年香港通识教育出现问题，一些教材刻意激化两地矛盾，一些试卷暗示学生“仇警”，当前这种局面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担忧。比如，西方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对大学生带来消极影响，大学生群体中流行看美国大片、吃麦当劳、听欧美流行音乐、过西方洋节日，而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节日认识模糊；青年大学生中存在的“佛系”现象、丧文化、攀比性消费、集体冷漠等，以价值虚无的本质消解了奋斗进取精神。这些现象值得警醒，发展大学素质教育务必要进行价值甄别，在放眼世界扩展视野的同时，务必要坚守意识形态底线。②善于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道：“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激发人们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优长，启发自己的思维。”发展大学素质教育，培养未来的时代新人，绝不能闭门造车，而是应该创新教育合作模式，打造交流合作网络，吸收其他文明的养分，培养青年一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三）“架天线”须对接全球科技变革前沿

“架天线”要对接全球科技变革前沿。这主要谈的是架什么的问题。“架天线”方式有很多，笔者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紧紧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也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等技术进步不断催生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计算机芯片处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分析计算技术等获得重大突破；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迅速发展；3D 打印、工业机器人、纳米技术等深刻影响产业模式。这样的变革趋势对知识记忆型的教育模式形成重大挑战。未来的素质教育要超越知识教育本身，要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广东工业大学作为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的理工科大学，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正着力与港澳高校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研究院，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和创新创业平台等资源，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的科研合作和成果分享转化，创新粤港澳学生联合培养模式；正着力与巴基斯坦高校共建人工智能创新研究中心，尝试境外合作办学模式；积极拓展高水平的外中合作办学项目，与世界排名前 200 名的高校开展 2+2 等课程衔接互认，构建国际课程衔接互认网络，着力引领在校学生直面全球科技创新前沿课题。

三、新时代大学素质教育要“接地气”，瞄准国家经济社会需求

“架天线”只是大学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来源于“接地气”。“天线”架得稳不稳，还得看“地气”接得足不足。如果只盯着上面而不看下面，不触碰和解决实际问题，大学素质教育就会流于口号，无法落到实处。因此，大学素质教育必须要“接地气”，要瞄准国家经济社会需求，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主要谈的是大学素质教育“怎么做”的问题。

（一）“接地气”须瞄准国家经济社会需求

是否瞄准国家经济社会需求，关系到大学素质教育是否有用的问题。高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其培养的高素质人才与经济社会需求无缝对接，毕业生才能受到社会各界的青睐。《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科技创新中心，这对能够适应产业转型升级、深度服务产业发展的理工科毕业生需求旺

盛,尤其需要具有国际视野、有坚实基础、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抓住这一重大机遇,近年来广东工业大学做出许多努力:设立产业技术研究开发院,统筹协调 10 个校地合作平台建设,契合湾区建设对高素质理工科人才需求;学校正规划建设广东工业大学跨界学院,将机器人联合学院、PCB 学院、IC 班等多专业进行融合,以跨界学院作为多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试点,整合全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联动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力量,以系统思维努力培养一大批创新型、复合型、引领型的高素质人才;学校高度重视科研成果转化,强调产学研融合,已经在广州、佛山、东莞、惠州、河源等多地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时任佛山市委书记的刘悦伦就点赞说“广工大研究院是最接地气研究院”。在对接产业需求方面,广工累计派出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科技特派员数量位列全国高校第二,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广工现象”。除此之外,在学生人文素养培育方面,学校也高度重视对接社会服务需求,组织高雅艺术进学校企业、社区乡村、军营,每年学生参加文化艺术实践达 1.6 万多人,将素质教育结出的硕果回馈社会。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我校积极作为,对口帮扶揭阳市,建设揭阳理工学院,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应用型理工科人才。

(二) “接地气”须坚持以生为本

是否坚持以生为本,关系到大学素质教育是否有效的问题。坚持以生为本,就要懂教育对象,要贴近学生、了解学生、关心学生。大学素质教育的对象是什么人?是一群千禧年前后出生的青年人,“00 后”已开始步入大学校园。他们思想活跃、观念新颖、兴趣广泛,接受新生事物快,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强,但因为阅历浅,容易从自身角度、从理想状态片面认识社会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尊重青年天性,照顾青年特点,经常到青年中去,同青年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高校要根据青年学生的身心特征,有针对性地搭建贴近学生需求、符合学生发展特点,构建学生喜闻乐见的机制与平台,让大学素质教育真正落地并取得实效。近年来,广东工业大学在这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坚持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推动学生工作进公寓,探索“学院+社区”学生工作模式,促进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关口下移,进一步融入学生;推进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导中心建设,在第一课堂四十五分钟的“大锅饭”之外,在课后第二课堂为学生提供“自助式加餐”,强化分层分类指导教育,提升学生的能力与素质;推动“互联网+”学生工作体系建设,强化“大数据”互联网思

维,加强学生网络舆情研判,简化学生办事流程,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推动学校人才培养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通过各种各样的“接地气”举措,广东工业大学努力引导学生在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专业技能,在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

(三) “接地气”须善于运用抓手

“接地气”要善于运用抓手,这关系到大学素质教育如何开展的问题。新时代大学素质教育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同各级各类教育、所有学科专业、社会职业密不可分,指向国民素质的代际提升问题。因此,发展大学素质教育要有新的抓手。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应寻找不同的抓手,从而实现素质教育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笔者认为,大学素质教育要采用“素质教育+ $N+X$ ”模式。具体说来,以素质教育为恒量, N 指代的是学生德智体美劳等各类素养, X 指的是某一专长与特色。以广东工业大学为例:①在 N 这一因子上,独立设置通识教育中心、文化素质教育中心(学校中层机构),通过三个保障(机构设置、教学条件、经费投入)、三个创新(“通识课程及讲座—校园文化艺术活动—高水平艺术展演与社会文化服务”三位一体教育模式、金字塔形教育结构、艺术实验教学创新)、三大品牌(课程及活动品牌、艺术展演品牌、艺术服务品牌),让学校工科生也具有文艺范儿。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文化素质教育中心是全国首个获批立项的省级公共艺术教育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除此之外,学校搭建20余个学生发展工作室,涉及大学生德育、创新创业、领导力提升、劳动教育等多个方面;组建上百个学生社团与协会,组织力量推进排瑶、皮影雕刻、广东省木偶戏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的建设。广东工业大学获准成为全国大学通识教育联盟成员,“春夏秋冬”项目获全国素质教育优秀品牌活动金奖,2019年6月学校甲组足球队勇夺2018—2019 CUFA全国总冠军,“背着妈妈上学”的学生董云获得“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称号,见义勇为英雄吴宏宇获得“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及第十二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特别奖”,这彰显着学校大学素质教育的成效。②在 X 这一因子上,广东工业大学依托工科优势,下足功夫着重培育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与素质。学校探索构建了多维协同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多专业融合、跨专业互动、创业引导、全程项目驱动等多种创新创业培养方案;通过与政府、产业、港澳多方协同,搭建富有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协同育人平台,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校园氛围。例如,与东莞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香港科技大学合办“粤港机器人学院”,每年在数学、控制、机械、计算机、工

业设计等多专业中选拔学生，在学生中广受欢迎；自 2013 年以来，学校“挑战杯”国赛连续三届获得“优胜杯”，创新创业工作获得“全国首批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等七项国家级荣誉，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近 100 家境内外媒体报道，学校素质教育初见成效。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新时代大学素质教育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既要“架天线”又要“接地气”。大学素质教育所培育的时代新人，既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犬儒主义者，而是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有本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17-10-28]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10.html>.
- [2][3]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EB/OL]. [2018-05-02]
http://www.ccps.gov.cn/xsxxk/zyjs/201812/t20181216_125673.shtml.
- [4] 习近平.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EB/OL] [2019-05-15]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5/15/c_1210134568.htm.
- [5]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B/OL]. [2019-04-3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4/30/c_1124436427.htm.

高校辅导员应对方式与自我判断、社会支持的调查研究

王晶晶 徐枫翔 苏科玮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 在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对高校辅导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 这要求高校辅导员自身要具备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稳定的心理健康状态。烦琐的事务工作、突发事件应对、自身定位发展等现实困境, 使高校辅导员群体面临多重矛盾, 这些矛盾和冲突会引发身心压力甚至心理健康问题。而高校辅导员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往往被忽视, 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又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本研究聚焦高校辅导员群体的压力应对方式特点, 以及与自我判断、

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显示,不同工作年限辅导员在应对方式、自我判断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应对方式与自我判断存在相关性。

关键词: 高校辅导员; 应对方式; 自我判断; 社会支持

在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对高校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做出明确的规定:协助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心理问题初步排查和疏导,组织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培育学生理性平和、乐观向上的健康心态。作为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高校辅导员工作一方面承担繁重工作带来的身心压力;另一方面要培育学生积极、乐观、向上的健康心态,这对辅导员自身的心理知识认知和运用、心理健康调节能力提出较高要求。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而目前对高校辅导员群体心理状况的研究并不多,因此,开展高校辅导员自身心理健康水平研究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对不同任职年限的辅导员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辅导员群体应对方式特点及与自我判断、社会支持变量的关系,为改善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水平提供数据支持。

一、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在北京市7所高校随机抽样选取被试,发放问卷290份,回收有效问卷275份,有效回收率为94.8%。根据高校辅导员工作年限,将被试分为三组:第一组,0~1年组;第二组,1~4年组;第三组,4年以上组。

(二) 工具与方法

1. 研究工具

选用应对方式问卷(CSQ)、自我判断调查表(SEI)、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应对方式问卷(CSQ):由6个分量表组成——解决问题、求助、合理化、自责、退避和幻想。每个分量表由若干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只有两个答案,“是”与“否”,选择“是”得1分,选择“否”得0分,其中19、36、39、42条目反向计分。根据每个分量表的得分解释个体或群体的应对方式类型和应对行为特点,解决问题和求助属于积极应对方式,自责、退避和幻想属于消极应对方式,合理化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呈正相关,属于混合型应对方式;自我判断调查

表 (SEI): 由北京大学心理系钱铭怡根据 Bandura 的理论观点编制而成。该量表有 8 个条目, 其中 3、4、7、8 项为反向记分。各项目按 5 级评分法记分, 1——非常像我, 2——比较像我, 3——有点像我, 4——不太像我, 5——完全不像我。总分越高, 表示自我效能水平越高。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 根据受试者得分情况分析社会支持状况。三个量表均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和重测信度, 适用于本研究。

2. 研究方法

问卷法对高校辅导员应对方式及自我判断、社会支持进行调查, 根据工作年限对样本进行分组, 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二、结果

(一) 不同工作年限的高校辅导员应对方式、自我判断、社会支持差异比较。

方差分析显示, 不同工作年限的高校辅导员在应对方式的合理化、幻想、问题解决、退避因子上呈显著性差异, 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 所有因子得分呈现先升后降趋势。自我判断和社会支持各组之间未见显著性差异 (见表 1)。

最小显著差异分析显示, 在自责和退避因子上, 0—1 年组和 1—4 年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1—4 年组相较于 0—1 年组更趋于选择自责和退避的消极应对方式; 在自我判断得分上, 4 年以上组自我效能感得分最高, 与 1—4 年组具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2)。

表 1 不同工作年限辅导员自我判断、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各因子差异比较

因子	工作年限			F (2,69)
	0-1 年 (N=85)	1-4 年 (N=120)	4 年 (N=70)	
自我判断	46.09+4.361	45.33+5.460	50.14+5.367	0.351
合理化	0.41+0.237	0.51+0.303	0.42+0.116	5.151*
幻想	0.37+0.240	0.49+0.322	0.27+0.138	4.208***
问题解决	0.88+0.160	0.91+0.069	0.86+0.116	1.661**
自责	0.246+0.247	0.407+0.344	0.257+0.223	5.804
寻求帮助	0.72+0.228	0.72+0.158	0.60+0.252	0.075
退避	0.37+0.268	0.52+0.301	0.36+0.283	4.606*
客观社会支持	9.63+3.135	9.33+3.133	10.57+3.047	0.186
主观社会支持	20.83+4.19	20.67+3.99	18.14+2.116	0.883
社会支持利用	8.46+1.755	8.43+1.755	8.43+1.512	0.095
社会支持总分	38.91+6.055	38.43+6.872	37.14+4.298	2.022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三、讨论

(一) 高校辅导员应对方式、自我判断、社会支持差异性分析

1. 工作年限一年以内的高校辅导员心理状态往往处在高度兴奋状态。表现出应对压力更多选择寻求帮助、问题解决的积极应对方式；较少使用自责、合理化消极应对方式；主观上愿意寻求他人帮助，也能够主动采取寻求他人支持的行为；对自己较为自信；通过努力工作来克服工作中的自卑感。这一时期与 Nicholson(1990)对于工作变换提出的过渡循环模型中的“面对”阶段类似：新入职者在新环境会建立“心理地图”，对工作充满好奇和评价，并与之前自己的期待进行对比，可能引发满意和希望，也可能引发焦虑和失望。Chao 等人(1994)指出新入职者需要六种信息：完成工作任务、建立人员关系、理解组织权力结构、理解专业术语、了解组织看重什么以及组织的历史，这为开展有针对性的高校辅导员培训提供了借鉴。

高校辅导员往往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青年人，这通常也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工作热情高，对自己和工作报有较高的期望，而且也愿意向有经验者求助，行动上积极主动。针对这一阶段寻求支持需求高、工作热情饱满等特点，高校辅导员在入职初期需要给予充分的外界支持，包括业务学习、组织融入、专项指导、个人规划、心理关注等方面的内容。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明确指出：建立国家、省级和高等学校三级辅导员培训体系。各级教育部门划拨专项经费、设立培训基地，对高校辅导员开展岗前培训、日常培训和骨干培训，确保每名专职辅导员每年参加不少于 16 个学时的校级培训，每 5 年参加 1 次国家级或省级培训，政策性措施有利于支持高校辅导员队伍保持工作热情，预防职业倦怠感。同时，这一阶段的高校辅导员也容易在高期待值与现实问题解决能力之间出现矛盾，容易产生挫败和失落，需要领导、同事、专业心理工作者等系统支持，从业务能力上提升，在人际关系中得到支持，从而增强解决问题能力和自信心。

2. 工作年限一至四年的高校辅导员，心理状态动荡不稳定，矛盾冲突较为明显。应对压力时，表现出一方面合理化、幻想、退避的消极应对心态，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努力解决问题的积极应对行为，容易自我冲突、自责和自我怀疑；较低自我效能感，认为自己能力不足，同时希望自己具备一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处在工作中自我认同和角色混乱的冲突中。这一阶段类似 Nicholson(1990)提出的过渡循环模型中的“调整”阶段：个人已经形成对工作环境的理解，寻求运

用这一理解去确定怎样长期从事这一工作。

这一阶段高校辅导员所体现出的矛盾冲突,有可能来自以下几方面:(1)高校辅导员工作压力加大。随着入职年限增加,工作经验丰富,所参与工作的难度和数量也会增加,在一项研究中显示,辅导员工作压力与积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均呈显著负相关。因此,这个阶段高校辅导员工作压力的加大带来矛盾和冲突的增加;(2)未来发展定位不明确。一至四年工作年限的高校辅导员,职称评定、岗位职务等变动频繁,更多思考未来生涯发展方向和定位。另外,这一阶段组建家庭也是重要的生活事件。工作压力大、职业发展不确定、家庭压力等因素会给高校辅导员带来矛盾和冲突。因此,缓解这一阶段高校辅导员矛盾冲突,建议:(1)加强高校辅导员职业认知与自我职业发展的匹配度,在遴选高校辅导员时选择对此工作有热情、有事业心、甘于奉献、有工作能力的胜任者。(2)预防职业倦怠感,给予持续个性化的职业发展指导和规划。一方面通过职业生涯业务学习,提高自我规划和协助学生规划的能力;另一方面,搭建高校辅导员专门渠道,提供职业规划、心理辅导等专业支持。这有利于提升主观幸福感,保持身心健康。(3)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指出:专职辅导员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应更加注重考察工作业绩和育人实效,单列计划、单设标准、单独评审,这为高校辅导员职业发展打通晋升渠道;同时要求高等学校要积极为辅导员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便利条件,应根据辅导员的工作特点,在岗位津贴、办公条件、通信经费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为辅导员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必要保障。

3. 工作年限四年以上的高校辅导员心理状态趋于稳定。表现出高自我效能感,更加自信,对自我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定位;应对压力,较少幻想和退避,同时寻求帮助和解决问题的动力和效率也有所降低;善于运用社会支持但仍感到自己的社会支持并不足够,客观世界与主观认知之间容易出现偏差。这一时期类似Nicholson(1990)提出的过渡循环模型中的“稳定化”阶段:工作中有经验的“老手”,善于设定目标完成既定工作,容易停滞、厌倦。

这一阶段的高校辅导员具备一定的业务水平,形成了自己的认知体系,趋向于稳定,但同时也存在消极思维和行动,往往自我调整来应对工作年限长而带来的职业倦怠感,四年以上高校辅导员所呈现的特点,与工作经验的积累有关,在工作中见识阅历多,对事件处理更能驾驭,逐渐形成自己的工作风格;但同时这一阶段高校辅导员也体现出了行动力减低、对事件判断更主观,主观上社会支持

意愿降低,这些特点显示有可能产生了职业倦怠。对于此阶段高校辅导员建议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打破辅导员较为封闭的生态系统,鼓励辅导员在教学、科研方面提升参与度,促进高校辅导员队伍全面健康发展。

(二) 高校辅导员应对方式、自我判断、社会支持相关性分析

高校辅导员应对方式中的积极应对因子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性,并且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性,这一研究结果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应对方式中的消极应对因子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性,并且与自我判断呈显著负相关性。由此可以看出,消极思维、消极行为是互相联系影响的,消极应对与较低自我效能感有关;同样积极思维、积极行为也是互相联系影响的,积极应对能更有意愿寻求和获得社会支持。

1. 积极应对方式中的问题解决与寻求帮助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体现出积极应对方式因子之间互相影响,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高校辅导员趋于聚焦问题的解决,并在困难时能主动寻求帮助,这一点在寻求帮助因子与社会支持利用以及社会支持总分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也可以体现,进一步分析来看,主观上愿意寻求帮助也就会在行动上采取寻求帮助的行动,得到的社会支持也会更多,这样又会激发主观上寻求帮助的动力。积极应对与社会支持的互动关系,可以协助高校辅导员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也会促发更高的自我效能和自信心。

2. 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呈现出的正相关,合理化与幻想、自责、退避;幻想与自责、退避;自责与退避呈显著正相关,可见,消极应对方式因子之间互相影响。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高校辅导员在应对压力时更趋向于在态度上自我指责、对事件结果易寻求借口进行合理化解、对事件应对往往自我幻想;在应对行为上较多的退避,表现出逃避、不作为等消极应对行为。并且,消极应对方式与自我判断呈现的负相关性,也说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高校辅导员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价值感较低,更需要适当的鼓励和正向引导。

四、结论

不同工作年限的高校辅导员在应对压力时有不同特点,应对方式与自我判断互相影响,应对方式的特点也在寻求社会支持方面有所体现。Nicholson(1990)提出的工作变换过渡循环四个阶段:准备、面对、调整和稳定化,在各阶段之间有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独有特点,同时各个阶段又互相依赖,即一个阶段所发生的事情对下一个阶段会有影响。成功的管理一个阶段使得成功管理下一个阶段更加

容易。这提示教育部门、高校要构建科学、专业有效的高校辅导员培养体系，在专业素养提升、晋升渠道打通、心理健康辅导和职业发展规划方面给予高校辅导员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2017 年 10 月 1 日施行
- [2]汪向东, 等.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 [3]、[4]、[7]、[10][英]约翰·阿诺德等著. 沈秀琼, 等, 译. 工作心理学[M].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391、392、393、391
- [5]、[9]王军. 高校辅导员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工作压力关系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第 17 卷第 12 期
- [6]张宏, 王晶, 彭洋. 关于高校辅导员幸福观的思考[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8(2): 57-58
- [8]龙霖, 等. 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及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J]. 当代医学 2017 年 10 月第 23 卷第 29 期总第 472 期

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引领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北京理工大学主题教育活动的分析思考

肖雄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100081)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青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围绕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等问题多次作出重要讲话、重要论述, 如, “青年时代树立正确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十分紧要”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从根本要求高等教育工作者要对标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加强大学生思想引领, 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筑牢精神之基。本文在客观分析当前大学生教育引导面临的形势问题的基础上, 以北京理工大学组织实施全校性主题教育活动为例, 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大学生思想引领的实效性和长效机制建设问题。

一、大学生教育引导面临的形势挑战和问题不足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多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内外部形势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工作者需要更加精准地对标根本任务要求，综合分析内外部环境新变化、工作对象新特点、方法手段新需求以及自身的不适应性等因素，找到大学生思想引领的有效方法路径。

大学生教育引导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挑战。从国内来看，当前，国家改革发展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各个领域社会热点相互叠加，并将压力向校园传导蔓延，影响着青年学生的思想认识和判断。从国际来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美国对华遏制打压频频上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对高校如何坚强有力地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提出严峻考验。

当前高校学生群体呈现诸多新的特点。2018 年是中国青少年群体代际转换的关键一年，“00 后”大规模步入大学，“00 后”一代成长发展伴随的是中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为“00 后”在生活、学习、发展等各个方面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保障，“00 后”身上表现出了鲜明的独立、开放、包容、国际化等特点，成为最活跃的群体。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了传播格局深刻变革，互联网日益成为各类风险的传导器和放大器，对我们面向“网生代”学生群体开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何适应当前学生新的群体特征开展扎实有效的思想引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的课题。

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存在诸多不适应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党团组织等各方面育人力量旗帜鲜明、声音嘹亮，在团结吸引青年学生、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方面开拓了生动的工作局面。但也必须看到，面向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形势和工作对象特点，高校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想引领的能力水平还不平衡，比如：有的学校存在思想引领的政治性、思想性不强，抓本质任务、核心任务不精准、不到位的问题；有的思想引领工作表面风风火火，实则存在覆盖学生不够、影响学生不够，入脑入心不够的问题；开展大学生思想引领还是存在传统的办讲座、发读本这样的直接形式多，内涵深刻、形式多样的方法手段创新不够的问题；还有的教职工在旗帜鲜明抓思想引领方面仍存在

政治觉悟、勇气担当弱化的问题。

以上形势和问题进一步表明,新形势下开展高校大学生思想引领的水平和质量与党和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需要我们更好地把握根本遵循,不断守正创新。

二、北京理工大学全校性主题教育活动的基本做法和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并且在全国教育大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我国教育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因此,2018年以来,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出发,突出把好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总开关,在全校学生群体中全覆盖开展“担复兴大任 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以之为抓手探索构建大学生思想引领长效机制,引导学生“四个正确认识”,坚定“四个自信”。形成如下主要做法:

强化组织领导,开展体系化设计。借鉴党中央历次主题教育的做法经验,通过学习、讨论、实践、选树、深化五个环节压茬推进,将“举一面旗帜、树一种信仰、走一条道路、叫一个名字、圆一个梦想”目标贯穿始终,构建起“学思践悟”相统一的教育体系。校院两级动员全覆盖,学校领导、全体学生工作干部全程化跟进教育过程,以“五个一”共识把青年团结起来,把人心凝聚起来,把分散力量集合起来,同育新人、共筑同心。

精心组织实施,推进关键任务。一是组织开展新思想大学习,在抓好思政课堂主渠道的同时,学校领导、全体辅导员深入学生,以学生党团支部为单位,推进新思想大学习全覆盖,990余次支部集体学习让思想旗帜树起来。二是组织开展“时代新人”标准大讨论,坚持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各团支部、各学院到学校自下而上层层开展大讨论,遴选的十大高频词汇亮明了同学们成长为时代新人的态度、立场和承诺,激发了青年的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三是推进“时代新人我践行”,打造“国情大课”“创新大课”两堂思政大课,组织开展“四大主题”社会实践行动和创新创业行动,集聚拓展校内外优势资源支持大学生开展社会观察和实践创新活动,使同学们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四是组织开展“时代新人说”大宣讲,以“人物、故事、精神”为主线,遴选优秀讲述人员开展支部“轮讲”,1000余篇时代故事,400余项新媒体作品让“争做时代新人”“做奋斗者”在校园蔚然成风。

丰富形式载体，强化仪式感教育。一是紧抓“五四”青年节时间节点，以师生集体升国旗仪式正式启动主题教育活动；紧抓“5.2”讲话发表重大契机，以组织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主题教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二是紧抓 2018 级入学首次集体活动，组织 3900 余名新生隆重举行军训临时党支部成立大会，全体学生工作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让新生入学第一印象定格在伴随朝阳铺展的鲜红党旗上；三是紧抓各学院广泛组织开展大宣讲的热潮，举办全校性大型讲述活动，让时代新人成为入脑入心的靓丽风景线。同时，在关键性任务和常态化教育过程中，不断强化主流舆论声势，全年全媒体宣传教育动态长流水、不断线，扩大主题教育覆盖面，巩固思想引领的正面舆论和正面声音。

主题教育活动给同学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活动专项调查显示，学生对主题教育活动满意度达 90% 以上。认为通过参与活动，提升了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2018 级学生提交入党申请书比例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300 人，青年学生使用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学生党员正确使用党言党语情况明显增多；拓展了认识视角和思维方式，82% 的同学认为自己加深了对国内外形势和国计民生热点问题的正确认识；建强了基层组织和骨干队伍，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清单、列规范，丰富了“三会一课”内容载体，激发了基层组织活力，也锻炼了一批学生积极分子和骨干队伍；激发了学生学习和创新创业热情，1300 余支学生团队 10000 余人次深入全国 34 个省区和 14 个国家主动开展社会实践、社会观察，5000 余项科技创新作品参与校级及以上创新创业赛事，学生社团活动、课外活动更加注重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校风学风更加积极向上。

北理工一贯有以大规模全校性主题教育活动开展大学生思想引领的优良传统。尤其是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每年坚持举办“信仰 青春 阳光”主题教育活动，至党的十九大，在总结深化历年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为“担复兴大任 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主题教育活动遵循大学生群体特征和特点，遵循知、信、意、行相统一的规律，融合学、思、践、悟丰富多彩形式，以鲜明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构建起了大学生思想引领的立体化平台和阵地，大量的实践反映出来的积极正向的学生反馈值得我们以之为实证进一步研究其中的方法和规律，凝练大学生思想引领的有效方法路径，进而形成长效机制。

三、建立大学生思想引领长效机制的若干思考

从北理工的实践来看,主题教育活动是大学生思想引领的一个有效抓手,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能够按照教育主体特定价值标准强化认同和引领的有效方式。从对北理工组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取得实效的经验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

大学生思想引领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特定的学术逻辑、认识逻辑和实践逻辑。北理工主题教育活动在组织开展新思想大学习环节,立足学深悟透、入脑入心的目标,没有自己闭门造车,而是着眼于协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力量共同画出育人同心圆,实现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三个逻辑”的统一。比如,选聘思政课青年教师骨干担任校团委兼职副书记指导思想引领工作,邀请思政课教师在重要时点到学生活动场所讲特别思政课、讲思政微课,将思政课实践教学环节与共青团大学生社会实践共同推进、共享学分,邀请马理论专家担任学生理论社团指导老师指导课外思想理论学习活动,这些举措让学生思想引领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从上述实践来看,大学生思想引领只有遵循尊重学术逻辑,才能更好地表达和传递科学理论的魅力,才能增强思想理论的说服力、穿透力,为学生讲清道理;只有遵循认识逻辑,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唯物论、辩证法的指导,才能让学生的日常思维、自然语言和自发行动触及思想引领的内在本质;只有遵循实践逻辑,探索实践育人的新方式,才能引导青年学生在参与实践、认知社会中加深对党的科学理论的内在认同,从而将认同转化为行为自觉。“三个逻辑”相统一的过程就是形成思想引领的基本逻辑过程,总体呈现为为大学生树立思想品德、情感信念标准,提出认识要求并促使受教育者将这些认识和情感内化于心转化为行为动机,指导受教育者的行为方式,以培养受教育者的行为习惯,在反复强化教育中逐渐外化为受教育者行动自觉。

大学生思想引领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特定的方法艺术。北理工主题教育活动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在整体上运用了系统思维方法,并兼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种科学方法。比如,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实施坚持“三化”:坚持系统化,在思政课和第二课堂思政拓展课中,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梳理和对党和国家最新方针政策的重点剖析相结合,做到纲举目张、点面结合;坚持层次化,秉持“教学相长”“教育者先受教育”的

理念，学校领导，学院党委副书记、书院学生工作副院长先学先悟，为新生上思政课，进支部同团员青年一起学习、讨论，及时对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正确引导和答疑解惑；坚持时代化，摒弃“派任务”“交总结”等传统做法，鼓励各单位结合各自单位历史传统和特色创新开展既“走心”，又“时尚”的教育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承担着传递教育内容、实现教育目标的使命，是教育者促进教育对象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的载体和路径。有效的大学生思想引领应是在系统思维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理论灌输法、实践锻炼法、自我教育法、榜样示范法、咨询辅导法等多种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理论灌输意在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武装头脑，“灌输”体现的是教育方法的本质特征即思想感化、思想影响，而非指具体生硬的形式。实践锻炼法重在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强化，促进知行转化，带动学生把业已形成的思想认识逐步转化为自己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自我教育法强调教育者主动驾驭的能力，在教育活动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从而调动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动机，如北理工“时代新人标准大讨论”正是这样的教育者主动调动、受教育者主动思考，从而共同达到教育目的的过程。榜样示范和咨询辅导则重点解决思想引领与成长成才的现实结合问题，彰显着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力。

大学生思想引领要加强组织实施和教育过程的科学规划、规范化管理。北理工主题教育活动由学校党委主导、共青团主实施，在全校范围内全覆盖开展，在“大思政”工作格局下，构建了职能部门协同参与、各基层党组织统筹推进，依托共青团组织覆盖优势组织实施的工作体系，形成了一条“组织主导、学生主体、典型示范、上下联动”的“学生群众路线教育之路”；主题教育活动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把思想引领作为贯穿全年全程的一条主线抓在经常、融入日常，一系列重点活动项目有序推进，在校园形成了一股浓厚的时代新人成长新风。可以讲，大学生思想引领并不是简单的学生第二课堂自娱自乐活动，重在教育而非“活动”，其实效性和长效机制建设的关键在于要按照思想政治工作原理和规律开展科学化、规范化的精心设计和有序组织实施。

科学规划要坚持方向原则（把政治方向）、渗透原则（加强贯穿融入）、层次原则（尊重差异分层分步骤推进）、激励原则（正面强化）等思想政治

教育的基本行为准则，在此基础上有序推进教育任务。规范化管理强调在组织实施大学生思想引领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管理活动的基本要素，形成开展工作的基本手段。从上文分析来看，北理工主题教育活动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正是组织领导、组织体系、组织管理的保障，是科学管理、规范化管理的结果。因此，在探索构建大学生思想引领长效机制的过程中，要在综合运用管理手段的同时，实施好目标管理、计划管理、信息管理、队伍管理等内容，把握运用好科学决策的形成过程、执行过程和总结反馈过程，强化优势资源的有效整合，以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任务的创造性活动。

总之，新形势下开展大学生思想引领应高度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助力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关键点，以党对青年人才的根本需求为牵引，全面服务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育人模式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实现育人与育才的有机统一。

中国优秀文化的“浸润式”培养模式

丁晓萍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420）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和人才培养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人文学院，不断探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新模式，结合课堂教学，设计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目的形式多样的文化素质教育实践活动，有目的地创建教学实践场景，构建“传统文化浸润”的环境，积极引导学生的主体参与性，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中国学生的“文化自觉”和国际学生的“文化亲近”，最终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育目的。

关键词：中华文化遗产；“浸润式”培养；文化自觉；文化亲近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

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需要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要建立在对自己所处文化的历史、发展、特色的全面认知之上。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在国家形象宣传中，要立足于中国文化、中国国情，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递文明、开放、和平的真实中国形象，因此面对大学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学生数量的不断增长，通过有效方式培养国际学生对中文文化的亲近感，也成为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应有之意。近几年，上海交通大学在通过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式”培养，以实现中国学生的“文化自觉”和国际学生的“文化亲近”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

一、背景

随着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学位生人数越来越多，目前国际学位生每年近 2000 人，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作用，针对的不仅仅是如何让中国学生传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更有如何向世界、向国际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的问题，因此探索中国优秀文化传承的新模式，为实现中国学生的文化自觉和增强国际学生的文化亲近开拓有效途径，是新时代赋予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使命。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 1997 年首次提出来的，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多元化是当今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整个社会都面临着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批判与继承、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等关系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国内大学生，已经从“90 后”到“00 后”，他们从小受到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传播的多元文化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既对民族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也往往肤浅表面。如果这一代人对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缺乏了解，不但可能产生文化困惑和民族文化认同危

机,更可能成为“无根”的一代,而出现自身存在危机。一个缺乏文化自觉的人,如何具有文化自信,一个缺乏文化自信的人,又如何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面对受多元文化影响成长的一代,如何以好的形式与载体,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体悟其独特魅力,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无论是担负着文化育人职责的大学,还是肩负着育人重任的大学教师,都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上海交通大学虽然把汉语和中国文化概论作为所有国际学生的必修课,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尤其是散落在全校各个专业、汉语水平参差不齐、文化背景差异巨大的国际学生,如何在有限的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的课堂教学之外,通过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文化体验,引导他们走进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加深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了解,产生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培养“知华友华”人士的崇高目的,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文化的传承不同于一般知识的习得,不仅需要记忆和理解,更加强调认同和内化。因此我们近年来探讨一种优秀文化的“浸润式”培养模式,通过全方位的“传统文化浸润”环境的构建,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亲近”的目标。在发挥第一课堂主渠道作用之外,面向中国学生设计以传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目的形式多样的文化素质教育实践活动,构建浓郁的中华文化氛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学生的心灵,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培养学生成为弘扬与传承中华文化的主体,以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育目的;面向国际学生,则设计多种文化体验方式,创造更多体验和亲近传统文化的机会,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二、了解民族的“根”与“魂”,提高中国学生文化自信

在培养中国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方面,主要通过设计以传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目的形式多样的文化素质教育实践活动,在全校营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帮助学生认识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上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了解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具体通过以下三种形式得以实现。

1. “九歌杯”人文知识竞赛:搭建平台,撒播人文种子

以《楚辞》之《九歌》篇命名的“九歌杯”人文知识竞赛以传播人文精神、启迪人文情怀为目的,赛制策划、题库建设以及比赛组织等均由人文学院学生自

主完成,教师以顾问形式做专业指导。“九歌杯”人文知识竞赛每一年设一主题,“经典点亮眼睛”“寻人文之芳华·承大学之精魂”“长相思兮长相忆——寻找经典中的爱情”“特立独行与抱团取暖”“且行且吟”“歌舞旧升平——乱世中的人文情怀”“曾经风雅,历史长河中的蒹葭往事”等主题,均从不同角度探寻古典与现代的结合,促使学生体悟传统文化之精髓,传承民族文化之基因,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培养学生文化素养,提高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学生自主组织管理的形式,又促进学生转被动教育为自我教育,激发了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外在的知识内化为修养。

自 2008 年起,“九歌杯”人文知识竞赛已举办 10 届,每年吸引了近 20 个学院以及华师大的学生组队参加,逐渐成为上海交大最著名、最权威、参与度最广的人文知识类竞赛,成为交大一张文化名片,扎实推进了校园文化的蓬勃发展。“九歌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的“薪火传承”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交大学子的人文情怀,在交大这片土地上播撒下人文的种子,

2. “仓颉杯”汉字识用大赛: 汉字文化搭桥,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汉字,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和精神根基,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学科”和“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接触的汉字是最容易引起学生深入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切入点。

基于此背景,结合人文学院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汉字与中国文化”、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汉字文化”等课程,我们于 2016 年举办了上海交通大学首届“仓颉杯”汉字识用大赛,旨在以汉字文化搭桥,引导学生认识汉字之美,感受文明的传递,增强对汉字的亲近感与文化认同感,以实现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远景,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交大学子推广普通话、规范汉字书写,提升交大学子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

首届“仓颉杯”汉字识用大赛从选拔至初赛、复赛,历时 7 个月,比赛通过网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吸引了全校各个学院的关注与积极参与。其中,人文学院文字学专业教师,对入选学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和辅导。培训的过程就是有效的教育过程。正如参赛选手邹凌青所言:“比起最终的赛事,备赛时所收获的知识更让我觉得不虚此行。”与此同时,我们选拔学生组队参加了上海市第二届大学生汉字听写大会并荣获团体二等奖,参赛队员分别来自人文学院、国

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化工学院。参与学生都有一个共同体会，即参加汉字大赛，不仅仅是学习了汉字知识，更是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迸发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仓颉杯”汉字识用大赛还吸引了沪上高校的热情参与。在决赛之夜的现场，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与参赛选手和现场评委踊跃互动，答题环节亦妙趣横生，从古文字辨析到字谜竞猜，各种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再一次让全场观众感受到了汉字之美。而来自教育部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的教授担任评委，也为现场观众“说文解字”，印证了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论断：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一位现场观众学生深有感触地说：“嘉宾老师的一句‘一个汉字就是一部文化史’，令人如有醍醐灌顶之感。汉字不同于各国的拼音文字，是人类文明中独树一帜的‘意音’文字，是代表中华文明的古老载体。今天的汉字识用大赛结束后，我深深感受到，青年学生只有学好汉字、用好汉字，才能承载好中国梦，传播好中国梦。”

“仓颉杯”汉字识用大赛两年举办一次，2018年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们将力争让它成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另一张文化名片，并最终成为面向沪上各高校的重要文化赛事。

3. 暑期社会实践：走向社会，行万里路寻文化源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化的深度理解和高度认同需要将书本知识与现实体现相印证，实现“知行合一”。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在加强校园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引导学生通过暑期社会实践走入社会、探访民情、文化溯源，了解民族优秀文化并承担文化传承的使命。主要工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与人文学院团委组织成立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重点团队。如2013年的“京杭交南北，水韵通古今”、2014年的“传承民族文化精髓，探寻草原文明源流”和“徽州人文行，点滴中国情”、2015年的“孔孟情怀、老区未来”、2016年的“传承民族文化精髓，探寻草原文明源流”和“乌镇——探索文化旅游之路”、2017年的“探寻语言文化的力量，体悟草原文化的影响”等。二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尝试扩大参与社会实践的受众面，激发学生自主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创新实施了以招标立项的方式开展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2014年设立了两个项目，共组织了4个团队，分别为“玉文化认同与传播：史前上海出土玉器遗址分布图绘制”和“追寻文化名人的足迹”（分别以“上海交大文化名人故居探访”“上海文学家故居探访”和“上海艺术家故居

探访”为主题组成 3 个团队)。这些文化实践项目吸引了不少其他学院尤其是理工科学院的学生参加,对非人文学院的学生来说,这种文化追寻活动有助于他们进一步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理解文化遗产的意义,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也为不同学科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沟通交流、共同成长的实践育人平台。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们有机会“深入理解塑造当代中国的文化根基”,进而“真切体会到‘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社会责任感”。

三、体验中华文化,培养国际学生的文化亲近感

将文化学习与文化体验相融合,是培养国际学生对中国的理解与亲近的有效途径,也可为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广和国家形象宣传产生重要作用。主要也通过三种形式得以实现。

1. 与业界专家互动:体验中国传统艺术魅力

在人文学院为留学生开设的中国文化概论课中,每个学期都会邀请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分院的京剧演员和上海民族乐团的民乐演奏家走进课堂开设京剧艺术和民乐艺术的专题讲座,表演示范加深入浅出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对中国的京剧艺术和民族音乐有了直观的感受与理解,穿上戏服跟着老师学习京剧表演、接触民族乐器尝试演奏的互动方式更是让学生异常兴奋。这种体验提升了国际学生了解甚至进一步学习中国传统艺术的兴趣。有的学生说:“非常感恩能有中国文化概论这种课程,可以学习和探索中国文化传统,通过课程学习和现场体验,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有的学生说:“很想把中国文化带到我的国家,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带给全世界更多更好的利益。”

2. 文化之旅:感受中国历史与文化

为国际学生设计了“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上海博物馆之旅”与“上海文化溯源——探寻徐家汇源”两大系列的文化体验活动。“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上海博物馆之旅”,结合上海博物馆教育服务的重点,以根植于文物和文化基础上的博物馆文物、艺术、美育教育展开体验活动,以增强留学生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认识及理解,同时培养其艺术人文素养,促进其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上海文化溯源——探寻徐家汇源”则围绕徐家汇源的历史文化景观与遗址、遗迹、历史建筑设计不同的专题徒步行走路线,用双脚丈量上海文化的厚度和深度,感受上海独特的文化气息。这样的文化之旅活动,让学生进一步认识了上海的过去与现代,认识到上海摩登背后的历史积淀,理解了促使上海乃

至中国发展的力量。而这些不是教师在课堂上干巴巴讲授的内容,是他们自己亲身体会所获得的。有学生感叹说:“我以前对上海的印象就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在各个地区,到处都是一片繁华景象,但这次的文化之旅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上海,一个充满着文化底蕴的上海。我不禁暗自感叹,中华大地不愧是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沉淀,繁荣的背后也有着深深的历史烙印,再加上现代文明的高速建设,定能让这个国家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

3. 语言文化体验夏令营:宣传中国形象

2017年7月、2018年7月,由国家汉办资助,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邀请了来自15个国家的23名在Coursera平台学习“你好,中文”课程的学生,来到上海交通大学进行为期两周的汉语学习和文化体验。他们上午在教室学习汉语知识,下午则是各种文化体验课,包括剪纸、书法、绘画、太极拳、汉字课、茶文化讲座等。夏令营还安排了马戏表演观赏及上海市区、苏州等地的观光旅游。文化体验课和观光旅游,让这些大都是第一次来中国的学习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与现代中国的发展,体会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中华文化的魅力。两周的中国生活让来自五大洲不同肤色的学习者因为汉语而产生了深厚的友谊,也激发了他们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语言文化体验夏令营不仅在帮助海外学习者掌握汉语方面具有出色的效果,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介绍中国文化、宣传中国形象的手段,这样的活动加深了海外汉语学习者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为他们打开了了解中国之门,不少学生表示未来也会继续学习汉语并寻求来中国实习和深造的机会。

四、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灿烂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式”培养模式的探寻就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文化基因传承理念,以丰富多样的方式充分发挥优秀文化的育人作用,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立德树人的实践中。

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结合课堂教学,有目的地创建教学实践场景,在课堂外创造更多体检和亲近传统文化的机会,构建“传统文化浸润”的环境,积极引导学生的主体参与性,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亲近”,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在开展的多项活动中,都强调对学生自主学习的激发,在面向留学生

的文化体验活动中,中国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一方面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转被动教育为主动教育;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团结合作、组织协调等各方面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既是传统文化的接受者又是传播者,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精神滋养,又培养了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意识。我们在让中国学生成为传承中华文化主体的同时,面对国际学生,则通过对话交流,和谐传播中国文化。文化传播需要建立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这种对话可以是语言的交际也可以是文化形态的全景式呈现,我们的目的则是后者,这种文化形态的全景式呈现有助于增进国际学生对中华文化场所、元素的体验度与认同度,为培养知华友华人士起到良好作用。

多年来,中国优秀文化的“浸润式”培养已成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让学生在文化体验中培养了“文化自信”与“文化亲近”,更增强了不同文化背景学生之间的尊重与宽容,培养了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作为未来的推广,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成为国际学生文化体验活动的志愿者,并在此过程中承担中华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九歌杯”和“仓颉杯”将向国际学生辐射,而暑期社会实践也将吸纳更多的留学生参加。事实上,连续三年的鄂尔多斯社会实践都有留学生加入,这样的实践活动让他们有了近距离了解中国社会、感受中国文化魅力的机会,是培养“知华友华”留学生的有效途径。2017 年鄂尔多斯社会实践团团长记录的一件事情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在参观抗日英雄纪念碑的时候,考虑到我们团队中有一位日本留学生,我内心有点担心,于是向这位叫马场直人的日本留学生投去询问的目光。他立刻领悟到了我的意思,笑着悄悄对我说:‘亚茹姐,你不用担心,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之前在沙漠科学馆里了解到日本志愿者在到恩格贝植树造林,为恩格贝的荒漠化治理做出了贡献,我觉得很骄傲。那么面对日本做过的不好的事,我们也应该承认和面对,接受批评并道歉。’走近抗日英雄纪念碑的时候,小马看到碑前的一束花倒了,毫不犹豫地地上前将花束扶正,并在碑前鞠躬。那一瞬间,我感受到新时代青年的包容和自觉,感受到这个时代赋予青年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及青年对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我们渴望和平,渴望这个世界共同发展,渴望这个世界如绿色般健康活泼,如黄色般阳光向上。”诚然,培养为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平发展做贡献的优秀人才,是大学的职责,也是我们育人的最高宗旨。

打造两大“导引”课程 助推通识教育改革 ——武汉大学新一轮通识教育改革的新看点

冯惠敏 郭路瑶 熊淦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武汉 430072)

摘要:近年来,为了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武汉大学不断推进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本科教育改革。自2016年始,武汉大学启动了新一轮通识教育改革,经过两年多时间的酝酿与准备,2018年9月,武汉大学正式面向全校本科新生实施新通识教育课程体系——“4-2-660”通识课程系统。新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举全校之力,开设了两门基础通识课程——“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和“自然科学经典导引”,旨在建设高品质的经典通识基础课程。两门“导引”课程实施以来,受到国内外高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它标志着武汉大学通识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两门“导引”课程建设进行梳理、剖析,对国内外大学通识课程改革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通识教育;导引课程;经典导引;小班研讨

武汉大学是国内较早开始进行通识教育改革的高校,经过多年的探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通识课程体系和运行模式,打造了大批优秀的通识教育课程。

一、两大“导引”课程出台的背景

武汉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不断探索尝试通识教育。武汉大学通识教育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形成了三个不断升级完善的版本,即2003—2013年的武大通识1.0版本,2014—2017年的武大通识2.0版本,2016启动、2018运行的武大通识3.0版本。其中2018年运行的武汉大学“通识教育3.0”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武汉大学自2018年秋季开始实施“通识教育3.0”课程体系——“4-2-660”通识课程系统,即通识课程共分为四大板块,四大模块中开设2门“导引”基础课程,60门核心课程、600门一般课程,从2018年开始,按照计划逐年分级分阶段分批次进行建设。“通识教育3.0”的实施,特别是其中的2门

“导引”基础课程的建设，标志着武汉大学通识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 2018 年以后，武汉大学通识教育的改革重心逐渐过渡到对通识课程的优选与组织课程实施上。作为武汉大学全体本科生共同选修的融通古今中外的优质“共同核心课程”，两大“导引”课程——“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和“自然科学经典导引”精选了古今中外 22 部伟大著作的经典内容编制阅读教材，旨在对新生进行高质量“启蒙”性质的通识教育，打开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博雅品位，养成学生君子人格，并为后面的核心通识课程及一般通识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所谓的“经典”追溯到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得，中国的孔、孟、荀等一系列的先贤，他们关于人、关于自然、关于社会的最精辟的思考和智慧的结晶，都包含在其中。历经多少人多少代都证明了其具有某种永恒性、普识性。在时间、空间上都得以延续，引发后人的深思，这是最好的精神养料，也是大学生进行经典阅读的意义所在。

武汉大学设置的“人文社科经典导引”与“自然科学经典导引”经典基础通识核心课程是在学习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之上，结合了自身发展的特点与需求进行创新和改进。众所周知，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代表了亚洲一种典型的通识教育模式，其学院通识与书院通识结合的课程形式有利于促进学生“完整人格”的养成。香港中文大学通识课程分为三类：基础通识课程、书院通识课程与大学通识课程。基础通识课程——“与自然对话”和“与人文对话”，共计 6 学分，由大学通识教育部提供；书院通识课程 6 学分，由各大书院提供并同时开展大量的课外活动；大学通识课程包括四大领域：中华传统文化，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与文化，自我与人文，共计 9 学分，由各个学系提供，大学通识教育部负责课程的准入审查和质量评鉴。从 2017 年年底到 2018 年 9 月，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专家小组曾多次赴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实地考察，并邀请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专家来武汉大学与校内师生进行交流，对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改革做深入的经验分享与探讨。武汉大学此次改革中两大“导引”课的出台，正是基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基础通识课程——“与自然对话”和“与人文对话”的改良与创新。

二、两大“导引”课程的组织和实施

两大“导引”作为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已经写入《2018 武汉大学本科

人才培养方案》。其中,本科教学培养计划部分明确规定通识教育课程为12学分,两大“导引”课程共4学分,占通识课程总学分的1/3。在2018级本科新生入学之前,学校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时,将“人文社科经典导引”与“自然科学经典导引”两门课程教材赠予学生,供学生阅览,使学生提前进入本科通识教育学习阶段。

“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分别以仁性、天性、悟性、使命、博雅、爱恨、历史、生命、审美、自由、理性、正义等12个关键词,从《论语》《庄子》《坛经》《史记》《文心雕龙》《红楼梦》《历史》《斐多篇》《审美教育书简》《论法的精神》《国富论》《正义论》等12部中外伟大著作中节选部分精彩章节编制。每一部经典著作节选部分的后面专门列举了课外博览书目,并且设置了5~6个小班研讨问题,为学生提供课外阅读参考,促进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深入这些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自然科学经典导引”精选《理想国》《形而上学》《西方科学的起源》《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物种起源》《DNA:生命的秘密》《惊人的假说》《几何原本》《科学与假设》等部分精彩章节编制。每一经典名著节选还提供了中英文对照,使读者能增加对作者在“原著”中所表达含意的理解。

(一) 两大“导引”课程的组织

学校自2016年开始启动,用2~3年时间进行准备,投入200万元经费和精英团队,举全校之力建设,打造两大“导引”课程。两门课程汇聚全校六大学部二十多个学院的优秀老师,共同教学。课程从“经典阅读”与“跨学科学习”两个层面,紧密围绕“何为‘人’?如何成‘人’?成为何‘人’?”三个问题,两本“导引”读本的内容涵盖了武汉大学通识教育的四大模块。精选古今中外22部伟大著作的经典内容编制阅读教材。“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课程模块希望通过研读经典著作,引导学生领会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精神,引导学生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理性地看待中华文化;“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课程模块是把自然科学内容加以概括,在探讨人类进步、人类自然等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塑造积极向上的生命观和人生观;“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课程模块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关注社会发展的动态和最前沿的社会问题,帮助学生深度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课程模块通过对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中外语言文

字等各种各样的艺术审美类经典作品的赏析，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

2018 年 3 月开始，两大“导引”课程的全体成员进行课程的前期筹备工作，主要是说课与录课。所谓“说课”，就是请“导引”课程中包含的 22 部经典的负责人各自讲解自己的授课思路并与其他老师一起探讨和完善，而“录课”则是为正式上课提供相对成熟的授课模板以供所有相关老师参考和借鉴。两大“导引”课的教师积极参与其中，集体备课的热情十分高涨。除此之外，学校从 2018 年 5 月起，面向武汉大学全日制在读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为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部分本科课程遴选研究生助教，推进“大班授课、小班研讨”课堂教学改革。助教岗位根据工作量不同，分为 A 类岗和 B 类岗。其中 A 类岗助教工作量最低不少于 8 学时/周，B 类岗助教工作量最低不少于 6 学时/周。两门导论基础通识课程到目前为止已招聘助教 288 人，其中“人文社科经典导引”B 类岗 144 人，“自然科学经典导引”A 类岗 144 人。2018 年 9 月，对研究生助教进行系统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通识教育基本理论、助教的基本职能、如何组织课堂讨论等。350 名通过报名资格审查的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培训，这是武汉大学首次面向全校招聘、系统培训本科生课程助教。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通识教育课程助教不足的问题，还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也增强了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学术交流能力和奉献服务意识。

助教在“导引”课程实施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根据主讲教师的要求随堂听课，协助主讲教师顺利完成课堂教学，包括分发资料、收集作业、辅导答疑、上习题课、组织课堂讨论等；建立自己所负责班级或讨论小班的 QQ 群、微信群，及时发布课程信息；协助主讲教师批阅作业、实验报告、试卷等；协助主讲教师进行课堂观察、课堂设计、课程问卷调查等教学咨询工作；协助任课教师搜集、整理并发布“小班研讨”所需文献资料，组织自己所负责小班的研讨活动，并做好记录；完成主讲教师及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安排的其他教学辅助工作等。助教成为学生和授课教师之间双向沟通和传递信息的桥梁，为课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为了保证通识教育两大“导引”课程的后续实施和改进，开课之前，通识教育中心对全体 2018 级新生设计了一份问卷，该问卷分别在开学前和学期

末对学生的通识素养进行检测,将前后测量的结果进行对比,既可以了解学生在学习“导引”课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又能发现学生在接受通识教育之后,在哪些方面获得了满足,以便于后续课程的改进与提高。

（二）两大“导引”课程的实施

两大“导引”课程均采用“大班授课,小班研讨”教学模式,将教学过程分为“教学+研讨”两个部分,通过大班教学的方式讲授基本的教学内容,在学生对课程基本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后,组织学生对已授内容进行分组讨论,引导学生对课程相关问题进行深度思考。

两大“导引”课程按照 3:1 的比例分配大班导读与小班研讨学时,具体教学方案分三个部分。第一,课前预习:大班授课之前,让学生按教师要求预习本课程单元经典,预习要求精确到某部书的多少页,教师通过课堂提问、书面问卷和线上交流等方式考查学生预习情况。第二,教师导读:教师采用大班授课的方式,概要性介绍该部经典的文化与学术背景,导读相关重点章节,为学生提供小班研讨思考题与文献资料。第三,学生研讨:小班研讨之前,学生须按教师提供的思考题准备发言稿(小论文)。每一次小班研讨,学生先分别作主题发言,然后共同作专题辩论。由武汉大学在读硕、博士研究生担任课程助教,负责主持每一小组的研讨课程。两大“导引”课程分别按照课前阅读占 20%,小班研讨占 30%,课程小论文占 50%的方式进行课程考核。目前这种课堂教学模式在国内许多高校本科教学中被广泛使用,但像武汉大学这样给每个班级都配置 5 名以上助教,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充足的助教资源和优质的课程资源相结合,保证了小班研讨课的质量。

三、两大“导引”课程的实施意义和效果

通过跨学科经典阅读模式,以成“人”为核心理念,两大“导引”课程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通识教育目标的实现。

（一）两大“导引”课程的实施意义

1. 有利于学生持续性阅读与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阅读习惯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摆脱应试教育的培养模式之后,阅读量的积累和自学能力的提升是大学新生必须具备的素养。“导引”课程的设置,培养学生形成深度阅读的习惯,增强思考能力。精选 22 部经典名著编制教材,在深度阅读这些经典著作与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将会不知不觉地

形成适合自己的阅读方法，增加阅读体验。在后续的学习中，基础导引课程关联核心课程和一般课程，学生逐渐形成自己的阅读体系，有利于持续性的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养成。

2. 有利于跨学科思维的学习与交汇

两大“导引”课程并非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学科，而是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拓展学生的思维，使学生了解、接受或者批判与自己本学科专业不同的论点与见解。对于文科学生，“自然科学经典导引”可以让其了解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培养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了解科学方法的特征，了解科学探究的贡献及局限；对于理工科学生，“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则更多地从价值观的角度，使其思考、讨论人生价值与社会议题。

3. 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大班授课，小班研讨”教学模式有效锻炼学生多方面能力。该模式坚持“教”“学”并重，增加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度，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教学效果。通过大班授课帮助学生了解经典名著相关背景，掌握相关基本知识与方法；通过小班研讨，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热情，深化经典名著的学习，锻炼学生清晰地表述自己的想法，促进同学间的交流，培养学生用批判的眼光分析与评价不同的论点。

4. 有利于陶冶情操，培养高雅情趣，塑造人格

透过经典作品的研读，使学生浸润在人类文明永恒的价值传统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言行举止，培养学生高雅的情趣。在自由阅读与报告发言准备过程中，学生也能感悟书目的文化精神，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

两大“导引”是“武大通识 3.0”的核心元素，旨在引领学生步入大学通识教育的大门，对于学生的博雅弘毅、成人成才发挥着重要作用。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叶中教授在 2018 年年初的武汉大学基础通识课程高级讲习班开班仪式上指出，两大“导引”课程是“2018 级新生品尝的第一道精神大餐”，认为“从中学到大学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期，用哲学家的话说，大一新生必须回答三大终极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因此，两大‘导引’课程首先是对大学生‘人生道路’的导引”。他还认为，“两大‘导引’课程是对大学生‘心灵提升’的导引。大一新生第一次远离父母和家乡，来到陌生的校园，如何与他人、环境和自己相处？如何认知人的天性、理性和

悟性？如何养成人的博雅、美感和自由？这些问题专业教育并不能回答，因此需要通识教育，需要两大“导引”。要让学生从经典中寻找答案。“两大‘导引’课程是对‘经典悦读’的导引。从‘应试教育’中走出来的中学生，对中外经典的接触大多仅限于教科书。何为经典？为何要读经典？如何阅读经典？阅读经典的意义及乐趣何在？……两大‘导引’不仅能提供深邃厚重的理论阐释，而且能提供丰富多彩的课堂实践。”

（二）两大“导引”课程的实施效果

两大导引课是武大通识 3.0 改革的具体实践，开武大历史先河，在国内亦属首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武汉大学自己编制的武大通识读本受到了许多高校教师的赞赏，许多教师和研究生都在借阅传看。2018 年 8 月《中国青年报》于要闻版刊发《为 2018 级新生端上第一道大餐 武汉大学：通识教材和录取通知书同时发出》，对武大通识 3.0 以及两大导引课进行了报道。国内多家媒体进行了转载以及跟踪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不仅仅是国内，两大导引课的理念也被通识教育中心的首席专家李建中教授传递到了国外。在 2018 年于美国召开的“全球通识教育与亚洲文本：大学生应该读什么”研讨会上，李建中教授应邀作题为“人：通识教育‘武大读本’第一关键词”的大会发言，“武大读本”即两大“导引”首次面向国际传递出了武汉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和精神。李建中教授的发言受到大会主席、ACTC 执行主席凯瑟琳·柏克（Kathleen Burk）教授的高度赞赏，她指出，武汉大学的两大“导引”在核心文本的遴选、核心观念的提炼以及核心方法，例如师生交互主体形式的尝试等方面，皆具有典范意义和推广价值。

两大“导引”课程从出台以来，受到社会和各大高校的广泛关注，这是对武汉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肯定和认可。响应国内目前通识教育改革趋势，回归大学的本位。武汉大学两大“导引”课程注重人文主义而非功利主义，课程建设更加科学化和系统化，课程体系的建设和管理都有专门机构的规划和监督，是一次较为系统全面的通识教育课程改革。两大“导引”2018 年刚开始进行第一轮试讲，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两大“导引”一定能成为武汉大学通识教育的标志性品牌，成为武汉大学全体本科生的优质“共同核心课程”，引领学生“成人成才”。

参考文献:

[1] 刘丽娜, 刘颖. 香港中文大学书院制通识教育的启示[J]. 教育观察, 2015(8): 49-50.

[2] 王逸凡, 余艳. 武汉大学首届研究生助教培训工作顺利开展[EB/OL].

<http://ugs.whu.edu.cn/info/1121/6215.htm>.

[3] 周叶中. 人才培养为本, 本科教育是根——关于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思考[J]. 中国大学教学, 2015(7).

素质教育课程与课程素质教育结合的有效载体研究 ——基于“课程社团化”的探索与实践

陈正江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活动课程是连接素质教育课程与课程素质教育的教育形态, 强调直接经验的价值与意义, 注重“过程”教育价值与学生自主学习。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通过探索与实践“课程社团化”改革, 将素质教育课程与课程素质教育有效结合, 并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课程社团化”从制度上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和机制, 发挥了重建师生对话、转换教学形式、创新育人模式的重要功能。

关键词: 素质教育; 课程; 活动课程; “课程社团化”;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一、活动课程: 连接素质教育课程与课程素质教育的教育形态

(一) 活动课程理论

活动课程理论强调课程即活动, 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杜威。杜威认为“课程最大流弊是与儿童生活不相沟通, 学科科目相互联系的中心点不是科学, 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通过研究成人的活动, 识别各种社会需要, 把它们转化成课程目标, 再进一步把这些目标转化成学生的学习活动。这种取向的重点是放在学生做些什么上, 而不是放在教材体现的学科体系上。以活动为取向的课程, 注意课程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在泰勒看来课程内容即学习经验, 而学习经验, 他认为“教育的基本手段是提供学习经验, 而不

是向学生展示各种事物”。这种观点强调学生是主动参与者，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学习的质和量决定于学生而不是课程，强调学生与外部环境的互相作用。教师的职责是构建适合学生能力与兴趣的各种情境，以便为每个学生的素质发展提供适合的教学。

（二）活动课程的特征

1. 强调直接经验的价值与意义。经验课程是作为学科课程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其目的就在于克服学科课程固有的缺陷。而学科课程主要的缺陷就在于强调间接经验而忽视了学生个人的直接经验，把对文化遗产的传承视为课程的主要宗旨，并认为通过间接经验的学习就可以高效率地促进学生的发展，而忽视对学生个人直接经验的改造。为此，经验课程则强调学生自身直接经验的价值与意义，强调应把直接经验作为课程目标的主要来源，致力于促进学生直接经验的改造。并认为只有把间接经验还原为学生的直接经验，把间接经验与学生个人的直接经验联系起来，实现“教材的心理学化”，学习才会更容易发生，学习对学生来说也才更有价值与意义。

2. 强调自主学习。通过关注需要与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不仅是经验课程的本质体现，也是经验课程与分科课程的重要区别之一。经验课程关注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特征，强调学生通过亲身实践来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获得直接经验，从而使学生在活动中不断自主选择并积极主动地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而非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学生成为活动过程的主体，自主调节着自己的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了自我设计、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同时在实施经验课程中，教师关注的不仅仅是学生在活动中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要对学生的态度、情感、学习能力、学习方法以及人际关系等各方面的素质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在评价的过程中，并不要求学生达到某种统一的、标准的目的，而是更多地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使每一位学生在活动中都能获得发展。

3. 注重“过程”的教育价值。由于经验课程注重学生在活动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因此，经验课程的教育目的蕴藏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注重整个活动对学生身心发展的影响，而非最后的考试成绩。这就克服了学科课程一般只重视学生学习结果，通过量化、可操作性的手段进行评价的弊端。经验课程更重视的是整个课程的实施过程以及学生在整个过程中获得的经验。重视的是使学生在活动中通过发现问题、设计方案、亲身实践以解决问题，从而促进他们的身心发展，增进他们对社会的了解，学会与他人合作，形成主动探索问题，思考与反省的习惯，并

最终了解自我、发展自我。即使学生最终没有能够完满地解决问题，他们也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感受成长的过程。这才是活动课程的主要目的。可以说，活动课程的价值就在于它整个的过程之中。

一、“课程社团化”的含义与特征

（一）“课程社团化”的含义

“课程社团化”即课程学习和社团活动的融合，是课程理论教学实践一体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效结合课程教学、能力训练和社团活动。由于社团活动是根据学生的现实需要和兴趣设计的，学习更多地体现为一群个体在共同探究有关课程过程中相互影响，整个学习活动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主、自动进行的，因而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展特长，不受教材的束缚。指导教师要担负起教书育人的职责，创造性地发展教学过程，开展课程（社团）教学，制订好教学计划，保证课程教学的有效开展，使课程教学成为一个动态的，多方交流的发现和发展知识的过程，教师是课程的开发者和研究者，选择和开发教学资源，设计开展教学活动。在活动中更多地融入课程要素和实践要素，以体现职业教育的职业性与实践性，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指导及促进作用以弥补专业课程教学的缺陷、形成个体间相互尊重的关系和提高学生的交流沟通能力。

课程社团化是当前高校课程改革的一种趋势，其目的在于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和实践育人。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课程教学研究学者库司在讨论课外活动的组织管理问题时，就提出了“课程化”的观点。他说：“然而，也许该问，有无必要为不该或不可能课程化的学生活动留有余地？课程化的完全实现将是漫长的。在此期间，我们要尽可能地使课程与课程活动密切配合起来。”在这里，库司第一次使用了“课程化”的概念的术语，并科学地预见课外活动也就是当前的社团活动课程化的漫长过程。简言之，课程社团化的实质即课程学习和社团活动的融合。它是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课程教学、能力训练和社团活动有效结合，寓课程学习于社团活动之中，持续提高课程学习的实效性。

（二）“课程社团化”的特征

课程社团化注重课程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学生生活于现实社会中，毕业后也将走向社会，学生与社会生活是统一的，“教育不能让学生远离现实世界，课程不能成为隔离学生与世界交往的屏障”。因此，经验课程致力于克服学科课程

的封闭性,力求更多向社会、向生活开放,为学生开辟一条与社会交互作用的渠道。经验课程的内容具有社会性。尽管经验课程也要求学生在学的过程中掌握知识,但是它的内容更多的是与现实生活、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并且力求突破原有学科课程封闭的知识体系,处于一种多元的、动态的环境中,使学生通过活动课程更好地了解社会,更多地参与社会实践,从中获得发展经验。课程强调“课程是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而不是孤立于生活世界的抽象存在”。经验课程的空间具有开放性。传统学科课程的学习地点局限于学校和教室中,然而,活动课程的地点则具有开放性,既可以在学校和教室中进行,也可以走向社会、走向大自然。学校、家庭、社会、工厂、商店、乡村,等等,都可以成为开展经验课程的场所。开放的空间开辟了通向社会的渠道,加强了经验课程与社会的联系。

一、“课程社团化”的特色与创新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的论断,这些思想在《民主主义与教育》及其一系列著作中得到充分阐释,成为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回归教育的基础、原点、本原,课程可以简化为具体的“行动目标。”教师们被告知,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清楚阐述让学生们做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做,要达到什么标准。人并非总是简单地循规蹈矩地干任何事情,也许人与实物工作时可以那样。那种简化过程叫自动化,而自动化不适用于人际交往,不适用于教学。

(一)“课程社团化”的主要特色

课程社团化是按照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科学设置和构建的,要实现课程模块教学与学生社团类型的合理对接,将现有的社团划分为文化艺术类、体育类、技能类、科技创新类等并进行合理的调整和重组,确保每门课程都对应有相应的学生社团,这极大地丰富了学校校本课程的内容,是校本课程向课外延伸的有效尝试,这种模式既增强了教师开发校本课程的积极性,也使校本课程更具生命力和活力。课程社团化使社团活动的内容与第二课堂活动课程内容吻合,取得社团活动的灵活性与课堂活动课程的规范性的平衡,要对社团活动计划进行统一的设计和规划,对已有的社团活动进行梳理和归纳,而不能简单地将第二课堂活动课程机械地搬到学生社团中,要努力发挥社团的自由性和灵活性,让社团在规范中持续运行。

(二)“课程社团化”的创新之处

1. 突破了传统课程教学的时空局限。通过重构常规教学组织形式,使教师、

学生、教学环境、教学资源等要素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课程发展系统。根据学校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资源状况,结合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要,设置供学生选择的、灵活安排的社团化课程,促进学生的个性成长。教师通过整合教学资源,围绕学生学习决定教学时间和空间安排,从静态到动态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课程的本质和规律,始终保持自己职业能力的适应性。

2. 构建了课程社团化的课程教学模型。以改进教学实践为导向,基于社团活动的学习共同体的形成,通过微观层面“自下而上”的课程改革,社团活动划归为教学活动的一部分,学校为社团活动安排了活动的场地、时间、指导教师,同时在经费、政策等方面学校都给予支持和帮助,使社团活动有效地进行,增强了社团活动的吸引力,并在实践运作中不断融入研究成果,完善管理与保障制度,构建课程社团化的课程教学模型。

二、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课程社团化”实践与探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是国家首批示范性高职院校和浙江省重点建设高职院校,2010 年,学校提出“课程社团化”改革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研究和扎实推动,把启发学生自觉和引导教师参与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落实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具体到课程课堂中,更体现在社团和课外活动上,构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一体化方案。

(一) “课程社团化”改革的院校背景

1. “六业贯通”的人才培养理念。随着年轻人拉着装满行李的拉杆箱走进大学校园,这标志着他们作为成年人中的一名新兴成员奔向独立和自主。学好专业是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第一位的任务,通过专业学习,实现专业成才,是最为基本的要求。学校构建了以金融类专业为核心,财会商贸类专业为主体,人文艺术类专业和信息技术类专业适度发展的航空型专业结构,并确立了以“办好专业、注重学业、强化职业、重视就业、鼓励创业、成就事业”为主线的“六业贯通”的人才培养理念。

2. 学生“千日成长工程”。学校生活是短暂的,头尾加起来大约 1000 天时间。然而,对为大学做好充分准备的或是对自己的未来有清晰的目标的学生而言,三年时间可能就够了。学校创造性提出了实施学生“千日成长工程”,且把它分解为“一年级金院学子,强调懂做人;二年级系部学友,强调精专业;三年级行业学徒,强调会做事”。倡导在“千日成长工程”中实现人人成长、天天成长、

健康成长、快速成长、持续成长、全面成长；真正做到同步实现：即品德优化、专业深化、技能强化和形象美化。努力践行“诚信、明理、笃行”的学风，真正做到明法理、明德理、明事理、明学理、明情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135791”职业生涯规划。志向远大和低就业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年轻人在向成年人转化时花费时间更长却更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年轻人对高等教育对谋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职业生涯规划既注重提升学生面向职业岗位的竞争力，又强调拓展学生应对社会发展和职业变迁的综合素质；既关注学校教育，又融入社会课堂；更好地整合了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要素和资源，促进学生从职场起步到实现成功人生。为推进学生顺利就业、优质就业和对口就业，鼓励学生创业，学校强化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内在联系，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育人、实践育人有机结合，提出“135791”规划，即一年熟悉岗位、三年成为骨干、五年成为尖子、七年实现发展、九年初就事业，一生平安幸福。可以说，这十年的发展对学生未来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课程社团化”的基本架构、组织形式及实施效果

1. 基本框架。学校以《交流与沟通技巧》和《保险职业素养与礼仪》课程作为“课程社团化”改革的探索试点，以实训为主要教学方式，设置了多种训练模块，并在此基础上选拔一批各有专长的教师组成课程教学团队，分别担任相应模块的教学。通过理论教学与实战训练，培养出一批懂得表达、敢于表达、善于表达、乐于表达的以沟通表达能力见长的相关专业的高职学生，为今后的就业奠定良好的口才基础和职业素养。课程采用课上与课下相结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的模式，不仅能够对于学生的口才和礼仪训练成果进行集中检验，同时也能为今后其他专业的培训方案制定做出指导和借鉴，使学生的沟通水平真正得以提升。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一系列实训项目的操作训练，培养学生成为表达能力见长的人。教学方式是以实训为主导，通过“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方式，层层推进，步步提高。

2. 组织形式。“课程社团化”改革试点的两门课程“交流与沟通技巧”和“保险职业素养与礼仪”在投资保险学院大一一年级学生中实施。对接职业活动与教育活动。将课程教学融入社团活动之中，使得职业教育和学生职业素质提升相辅相成。通过活动、竞赛、讲座、培训、素质拓展训练和学生社团等形式引导学生热爱所学专业，树立职业意识，培育职业态度，养成职业道德，塑造职业形象，形

成保险专业群。以学生独特的职业人格塑造模式为目标,培养品行良好、诚实守信、专业胜任、勤勉尽责的保险从业人员。按每学年新生数测算,两个学年中共有 950 名学生参加课程社团化改革试点。在开设上述课程的基础上,创新开展“口才训练营合格证书”和“保险职业素养与礼仪”考核制。由于课堂上每位学生的实战训练时间有限,所以在课后的第二课堂上采用集中训练的模式能有效地加强和巩固学生的训练效果。每个学期末,组织合格证书考核。评价体系是实训成绩与考试成绩相结合,各占 50%。内容模块包括诵读训练、复述训练、解说训练、演讲训练、采访训练、面试训练、辩论训练等。

3. 实施效果。课程社团化体系依托训练营的模式,按照“结合专业、集中设营、分片训练、统一管理”的运行机制,旨在提升职业素质与技能,学生参与积极性高,受益面广。课程社团化活动项目设计包括锻造学生职业技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崇高的职业理想,切实加强学生的身心素质和人文修养;与此同时,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心理承受与抗挫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将养成职业素质和提升职业技能相结合。在投资与保险系大一年级学生普遍参与的前提下,要求参加课程考核的学生占到全部参与学生的 1/2 强,达到 500 名,并从中择优选拔 10 支代表队参加省级、厅级、校级以上相关竞赛,获得团体及个人奖项 20 余项,其中包括浙江省大学生辩论赛(高职高专组)、浙江省大学生职业礼仪大赛、浙江省高校学生“感恩 诚信”主题演讲比赛、浙江省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选拔大赛暨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赛、下沙高教园区高职院校“辩才杯”辩论赛、下沙高教园区模拟联合国大赛、学院“金院杯”辩论赛、学院“新生杯”辩论赛、“信泰杯”保险职业技能大赛等。

三、“课程社团化”:素质教育课程与课程素质教育结合有效载体

高等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很重要的课题。我们的学生从普通高中生到社会职业人,需要具备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尤其是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背景下,探讨进一步做好高职院校素质教育课程与课程素质教育的结合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课程社团化”是素质教育课程与课程素质教育结合的有效载体,发挥着重建师生对话、转换教学形式、创新育人模式的重要功能。

（一）重建师生对话

“社团课程化”丰富了学校校本课程的内容。它是校本课程向课外延伸的有效尝试,这种模式既增强了教师开发校本课程的积极性,更使校本课程更具生命力和活力。重建师生对话是课程社团化的灵魂。教学不是简单的传递和灌输,教学过程不是单一的知识接受过程,而是一个知识建构,情感交流、道德发展、人格完善的过程。通过教师与学生的真实交往,与学生说贴心话,了解学生在想什么,真正掌握学生的生活实际,利用开放的平台,在更多场合——课堂、寝室、社团、实习单位等,与学生密切联系,了解其情感需求,不断了解学生发展的程度,优化管理与服务的内容,设计科学合理的项目和活动。

课程社团化使学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建构者,倡导建构性学习,寓课程学习于社团活动之中,不断提高学生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二）转换教学形式

“社团课程化”使社团活动更具吸引力。社团活动划归为教学活动的一部分,学校为社团活动安排了活动的场地、时间、指导教师,同时在经费、政策等方面学校都给予支持和帮助,使社团活动有效地进行。转换教学形式是课程社团化的核心。在传统的课程教学组织中,课堂是知识传递的场所,而在课程社团化的课堂,更多地赋予课程以灵活性、多样性和选择性,学生对待知识的态度从确定性的符号化、文本化的课程到情景性、生活化、体验性的课程转化。课程社团化基于社团活动基础开展课程教学改革,鼓励学生通过探究的、体验的和合作的方式积极主动地学习。

（三）创新育人模式

创新育人模式是课程社团化的根本。课程要素并未发生变化,而是使社团活动成为质疑问难,知识相遇,思想碰撞的教学活动场域,从而形成开放的课程发展系统,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和教师队伍素质提升。根据学校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资源状况,结合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要,设置供学生选择的、灵活安排的社团化课程,促进学生的个性成长。内丁斯指出,在所有我们强调的连续性里,师生关系的连续性其实是最容易建立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课程社团化转换了师生关系,使师生角色发生实质性变化,并在真实课堂中切实保证师生之间的深度互动,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的的时间大为增加,教师在社团活动中不断捕捉学生的动态并进行针对性的反馈,从而激发学生对学习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实现学生对各种知识的整合和能力的迁移。

卢梭在《爱弥尔》中主张孩子要抛开课堂，到大自然中去，让自己的手脚和眼睛当第一位老师，从直接的经验中学习，这在哲学上为现代教育奠定了基本的原则。“课程社团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里面既包括组织结构，也包括思想和行为模式，这是一个情感交流、道德发展和人格完善的过程。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建构者。因此，我们在发展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避免空洞的说教，没有从生活中提取有用的资源；不仅要道德层面倡导，更要从制度上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和机制，积极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美]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136.
- [2][美]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68.
- [3][美]拉尔夫·泰勒.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8.
- [4]引自吕达. 课程史论[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152.
- [5]徐国庆. 实践导向职业教育课程研究—技术学范式[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2.
- [6][美]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2.
- [7][法]让·卢梭. 爱弥儿: 论教育(上)[M]. 李平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23

主 编: 李和章	地 址: 北京理工大学中心教学楼 409 室
执行主编: 庞海苟	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秘书处
本期责编: 隋 艺	QQ 群: 696906044
本期美编: 隋 艺 陈思远	电 话: 010-68918556
邮 箱: cale_2011@163.com	网 址: http://case.bit.edu.cn/